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中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
与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生姓名：刘津铭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高云虹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研究方向：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

提交日期：2023年5月30日

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Worker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China

Candidate : Liu Jinming

Supervisor: Gao Yunhong

摘 要

随着我国区域性贫困与绝对贫困的消除,贫困治理的重心也由绝对贫困转向多维相对贫困。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相对弱势群体,与城镇劳动者相比,其在城谋生过程中更容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农民工群体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空间关联及演变特征,因地制宜改善其贫困状态,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 2014—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MDS), 首先对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其次,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生活保障三个维度选取六个指标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予以测度其在城多维剥夺状况。最后,运用 GIS 空间统计工具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我国 26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1)从整体上看,2014—2018 年我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呈改善趋势,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生活保障维度指标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2)从空间上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类城市群、各级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整体呈现改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国家级城市群、规模大以及等级高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减缓幅度更大。我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低—低集聚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与西部地区。(3)从影响因素上看,农民工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等个体特征与流入地财政支出、医疗服务供给、信息化建设等外部因素均影响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和流入地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不仅能有效发挥减贫效应,该效应还呈现一定的空间溢出特征。(4)本文就如何增强城市包容性、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增强农民工内生发展动力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差距,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共同富裕实现。

关键词: 农民工 多维相对贫困 空间分异 影响因素 中国

Abstract

With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regional poverty and absolute poverty, the focus of poverty management has shifted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he scope of research has expanded from rural to urban.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nto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earning a living in the city than urban worker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spatial variation,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improve their poverty statu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takes 26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26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bove in China by using GIS spatial statistical tool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From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hows improving trend, with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continuously decreasing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dimension index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of migrant workers also shows improving trend. (2) From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of China, various city clusters and cities at all levels shows an improving trend. The eastern region, national city clusters, large scale and high-ranking cities shows greater improving trend.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hows certain spatial dependence, with low-low concentration cities mainly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In terms of determinants,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workers such as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external determinants such as financial expenditure, medical service suppl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inflow areas all influenc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igrant workers and basic medical service supply in the inflow areas not only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 but also show certain spatial spillover characteristics. (4) This paper proposes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migrant workers' own motivation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external facilitation, with a view to narrowing the gap with urban workers and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Spatial variation; Determinants; China

目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2
1.2.2 研究方法	4
1.3 本文的创新	5
2 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6
2.1 相关理论基础	6
2.1.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6
2.1.2 推—拉理论	6
2.1.3 能力贫困理论	7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7
2.2.1 相对贫困的内涵与特征	7
2.2.2 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8
2.2.3 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10
2.2.4 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研究	12
2.2.5 研究评述	14
3 我国城市农民工相对贫困概况	15
3.1 数据来源	15
3.2 经济条件现状	15
3.3 自我发展现状	16
3.4 生活保障现状	17
4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19
4.1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19
4.1.1 多维相对贫困的 A-F 测度方法	19

4.1.2 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设定	20
4.2 整体分析	21
4.2.1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析	22
4.2.2 维度与指标分解	22
4.2.3 贫困阈值分析	23
4.3 空间分布特征	24
4.3.1 三大区域尺度分析	24
4.3.2 城市群尺度分析	27
4.3.3 城市尺度分析	29
4.3.4 贫困演变分析	32
4.4 空间关联特征	33
4.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33
4.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34
5 影响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因素分析	37
5.1 模型设定	37
5.2 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	37
5.2.1 变量设计	37
5.2.2 数据来源	39
5.3 回归结果分析	39
5.3.1 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39
5.3.2 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41
6 改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43
6.1 统筹协调城市建设, 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	43
6.2 提升生活保障水平,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44
6.3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增强内生脱贫动力	45
7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46
7.1 全文总结	46
7.2 不足与研究展望	46
参考文献	48

致谢 56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是全球所关注的重点难题。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与绝对贫困现象得以消除，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但是，绝对贫困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此完全消失，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意味着研究和解决贫困问题的重心已经转向相对贫困^[1]。随着贫困内涵丰富，相对贫困的瞄准对象应基于整个宏观视角，帮扶范围应由农村向城市延伸。伴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就业，截至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9亿。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城镇居民间的工资水平也在逐渐缩小。但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社会歧视等非制度因素影响，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医疗健康、社会保障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仍然存在显著差距。相较于农村贫困，农民工的贫困不仅带有部分原籍地痕迹，在流入城市后还表现出健康权益、教育程度、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被剥夺的窘境^[2]。换言之，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当前其相对贫困程度高于城镇居民。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扶贫方略将由此发展转变，由集中转向常规，扶贫对象从农村居民向城乡居民转变，也就意味着作为“第三元”群体的农民工也将纳为帮扶对象。就农民工的相对贫困而言，由于以往的扶贫范围主要包括“边老少穷”地区，城市中的流动群体仍然位于城市保障中的“真空地带”，农民工的相对贫困问题及其减贫进程并未取得较大进展^[3]。过去以单一经济维度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可能并未涵盖个人权力缺失、发展能力不足以及对福利主观感知等多维因素，从而致使相对贫困识别精度不足。脱贫攻坚时期，已有学者指出从空间视域下分析贫困问题，更有益于了解贫困与不平等在区域间的差异及其致贫诱因^[4]。郭劲光（2013）指出，贫困同样具备空间属性，可以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其演化趋势^[5]。后续对贫困现象的诱因研究也从个体能力缺失以及权利不足等个体特征因素，进一步考虑自然气候、道路密度等诸多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空间分异性^[6]。李鹏等（2021）指出，后全面小康时期，要实现从空

间视角探讨相对贫困的治理与识别,以体现贫困治理的多方面衔接^[7]。然而现有学者多通过经济数据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予以测度、分解,缺乏空间地理视角,难以直观地呈现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趋势。因此基于空间视角,探究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益于丰富现有的多维相对贫困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通过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由货币收入、消费支出作为衡量标准的单维相对贫困向多维相对贫困转变,从贫困深度以及广度综合测算农民工在城相对剥夺状况,并探究各维度对其相对贫困状况的贡献程度。基于不同研究尺度,通过直方图、折线图与空间地图将数据予以可视化处理,直观地反映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宏微观因素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以此丰富现有相对贫困的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2) 现实意义:农民工群体作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产物,由于制度与非制度因素,致使其陷入生活环境恶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被剥夺的窘境。如何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提高其获得感与满足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就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动态演进趋势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才可能有效缓解其相对贫困状态,从而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现实依据。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一拉理论与能力贫困理论;文献综述主要围绕相对贫困的内涵与特征、识别与测度、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国内外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现状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并进行文献评述。

第三部分为农民工相对贫困现状分析。运用微观调研数据，首先，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与生活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在城生活状况进行测度分析；其次，再分别从不同指标与城镇劳动者间的生活现状予以比较，初步分析两类群体间的差异。

第四部分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首先，运用双界限法对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予以测度；其次，分别从“三大区域—城市群—城市”等多层空间尺度出发，予以探究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再次，运用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探究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演变趋势；最后，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关联特征，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做铺垫。

第五部分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外部与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主要包括流入城市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内部影响包括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因素。构建时间与空间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予以分析各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第六部分为对策建议。依据我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别从统筹协调城市建设，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提升农民工在城生活保障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内生脱贫动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促使城市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缓解农民工在城相对贫困状态。

第七部分为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总结全文内容，指出本文的不足，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予以展望。

文章框架结构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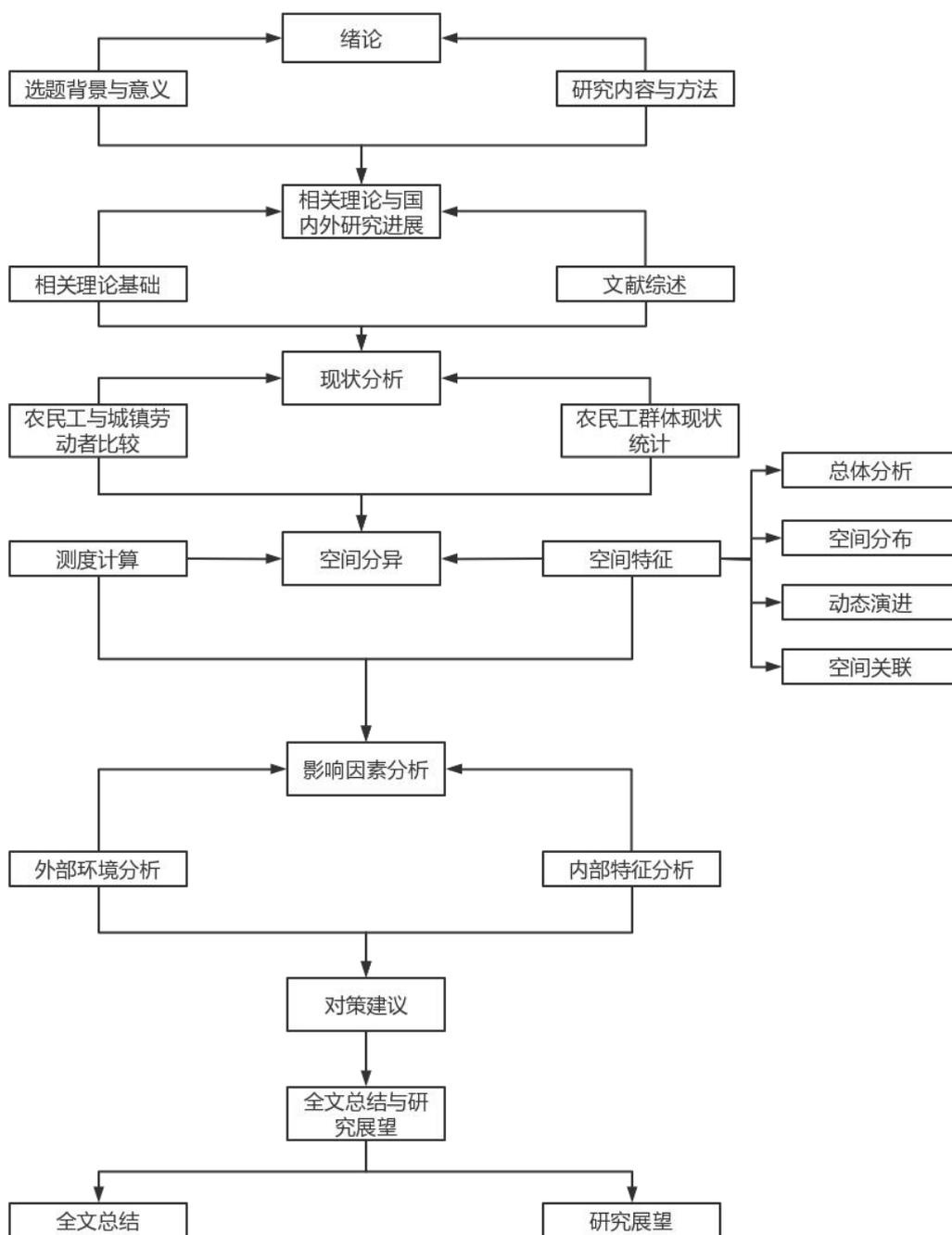


图 1.1 文章框架结构图

1.2.2 研究方法

(1) 比较分析法

本文的比较分析可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对比方面，本文不仅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在城生活状况整体进行了对比，还更细致地从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分析了两类群体的差异，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相对

贫困状况。在宏观对比方面，通过构建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运用 Stata.16 软件测算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基于空间视角，分别从“三大区域—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予以比较和分析，以此深入探讨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与地域差异。

（2）实证分析法

本文主要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研究农民工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城市医疗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信息化水平等内外部影响因素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通过构建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在传统计量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空间因素，考虑各个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此更为准确地识别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1.3 本文的创新

第一，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以及生活保障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收入、就业、教育、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予以测度其在城多维剥夺状况；

第二，基于空间视角，运用 Arcgis、GeoDa、Stata、Origin、Matlab 软件从多尺度探析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与空间演变特征；

第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内部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特征、外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征双重视角，予以分析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2 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于 1954 年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包含农业生产部门与现代化生产部门,两部门分别位于农村与城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力,进而促使其向城市现代化生产部门转移,其前提建设为现代生产部门劳务收入高于传统生产部门,且农业劳动力无限供应,直至突破拐点,二元经济结构会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逐步消失。此后,费景汉与拉尼斯进一步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以此完善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2.1.2 推—拉理论

拉文斯坦于 19 世纪最早对人口流动迁移展开系统研究并由此建立了“推力—拉力理论”。他指出,劳动力会通过权衡迁移的利弊,在经济收入低下于生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劳动力会通过向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流动,以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唐纳德博格则进一步完善了拉文斯坦的“推力—拉力理论”,他指出劳动力的流动迁移同时受到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影响,即劳动力的输出地与输入地间存在两种相反作用力,推动人口流出的推力以及吸引人口流入的拉力,两种相反作用力同时作用于劳动力迁移,且相互较量与比较。两种作用力可能同时存在于流入地与流出地,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禀赋匮乏、劳动资源过剩、经济收入低下、就业机会欠缺等因素成为劳动力迁出的推力,而熟悉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以及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则成为其回流的拉力。而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同样存在两种作用力,流入地可以为迁移劳动力提供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服务、优质教育资源、便利的现代化交通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具有强大的拉力,与此同时,严苛的户籍制度、高昂的生活成本、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对陌生的生活环境成为其回流的推力,因此,劳动力的迁移通常是在权衡利弊后对比择优。“推—拉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成乡二元结构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可以生动诠释农村劳动转移的动机与动力,在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研究中也可借鉴。

2.1.3 能力贫困理论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指出贫困不仅表征为经济收入的匮乏,同时也应包括政治、文化等各项权利与能力的缺失。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于贫困的认知,目前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为当今社会制定扶贫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贫困问题仍应聚焦至行为主体本身,也就是人身上。收入和消费的欠缺只是贫困的外在表征,其内涵是行为主体发展机会的欠缺,所以应将人的可行能力纳入到贫困识别的范畴,并强调这种能力不是某一方面的单一能力,而是包括与生活各要素息息相关的综合能力。个体陷入贫困的原因不仅包括收入与社会资源的匮乏,还包括能力的缺失,诸如社会参与能力、收入创造能力与机会获取能力。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需要具备获取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基本的社会保障、可持续的创收机会等能力的权力,以此维系自身生存。当个人或家庭缺乏获得幸福感、满足感的权利与能力时,就表示该个人或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对可行能力的认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贫困的认知,进而制更加科学的反贫困战略。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2.2.1 相对贫困的内涵与特征

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中,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转变,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扶贫区域由农村拓展至城市,货币收入匮乏向多维剥夺转变,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扶贫时代的主要任务^[8]。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是相对存在的概念,现有学者指出,只有充分明确相对贫困的概念与特征,才能深刻把握相对贫困的形成根源与治理路径^[9-10]。贫困概念的关键在于“贫”与“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人们更为关注“贫”。Rowntree(1901)首次明确了贫困的定义,他指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成本无法被现有经济状况满足,包括衣物、食物、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即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11]。随着人们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逐渐提高,贫困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由最初的“贫”延伸至“困”,贫困的内涵得以拓展,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演进,但其主要的识别方式仍然是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中位数(平均数)的百分比作为测度依据,但

在后扶贫时期，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个体被剥夺的真实状况 Townsend（1979）首次提出相对贫困概念，指出相对贫困是“绝对中的相对”，即相对贫困不仅意味着个体缺乏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条件，若生活资源与质量低于社会所认定的平均水平，即被界定为相对贫困^[12]。Sen（1983）提出“可行能力贫困剥夺理论”，他认为相对贫困同样也存在“绝对的核心”，包括个体创收能力与发展机会被剥夺，换言之，只有当个体具备良好的健康状况、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多样社会成就，才可摆脱相对贫困，提高生活质量^[13]。依据 Sen 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经济收入匮乏只是贫困的表征，其对个体的发展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其核心仍应该包括权力的缺失与资源的不足，诸如教育、医疗以及生活品质等各个方面，丰富了贫困的内涵与特征，使人们对贫困的认知由单一收入维度匮乏转向多维剥夺视角，现有学者表明，多维剥夺已然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14]。

相较于绝对贫困而言，相对贫困的特点更为多元化。相对贫困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相对性，社会排斥与相对剥夺是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为主客观相对性，对于主观性而言，人们对相对贫困的感知不仅取决于自身状况，在同社会其他群体对比后所形成的心理预期相关^[15]，客观性则表面相对贫困是可以度量的^[16]。二是分散性，后扶贫时代，区域与整体性贫困逐步让位于个体化和原子化的贫困形式^[17]，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集中式的农村贫困演变为离散化和流动性强的城乡交互式贫困^[18]。三是多维性，多维相对贫困既体现为个体由于收入匮乏从而难以维系自身基本生活水平，也包括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可行能力的缺失，即物质与精神贫困并存^[19]。四是脆弱性，相较于非贫困群体而言，相对贫困群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而陷入贫困循环陷阱^[20]。五是长期性，资源禀赋、经济机会、个人能力的差异，不仅决定了相对贫困治理的艰巨性，还会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及其“优胜劣汰”从而导致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与历史性特征^[21]。六是动态性，主要包括目标群体的动态性、随经济发展而变动的扶贫标准的动态性以及参照物不同而呈现的主观感受动态性^[22]。

2.2.2 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脱贫攻坚时期，贫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货币的短缺，即个体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费水平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则被认定为贫困，亦为绝对贫困。随着扶贫战略的

转换, 相对贫困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方迎风、周少驰 (2021) 指出, 目前仍尚未构建出全面系统的相对贫困测度标准, 因此相对贫困标准的确立对未来扶贫战略而言至关重要^[23]。世界银行将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 1/3 的人群视为相对贫困群体, 欧盟国家则采用的是中位收入标准, 在实际中普遍使用中位收入的 40%、50% 与 60% 三个比例予以界定相对贫困。潘文轩、阎新奇 (2020) 指出应继续沿用收入水平予以衡量相对贫困线, 也便于与国际衡量标准相接轨^[24]。现有学者指出, 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或均值作为基数, 按一定比例 (40%、50%、60%) 作为相对贫困线, 收入比例法识别标准不仅简单, 而且易于操作且方便公众理解^[25-28]。但依据 Sen 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 收入低下仅是贫困的外在表征, 还应该包括权力的缺失与资源的不足, 诸如教育、医疗以及生活品质等各个方面。周云波、贺坤 (2020) 指出, 通过构建包含收入在内的多维相对贫困识别矩阵能有效降低以单一收入维度作为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漏出率, 从而提高对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率与精准率^[29]。

目前, 关于相对贫困的多维测度方法并未达成统一, 但学术界常用的方法则是 AF 双界限法^[30]。双界限法是对 FGT 贫困指数法的修正与完善, AF 双界限法不仅可以满足多维贫困测度的若干公理化标准, 且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采纳, 为社会制定扶贫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31]。王小林、冯贺霞 (2020) 认为, 2020 年后的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以便精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相对贫困状况^[32]。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农民工在城现状及其贫困成因, 运用 AF 法或 FGT 法, 综合考虑权利贫困、物质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福利贫困, 构建多维贫困指数衡量农民工在城剥夺状况, 进而提供适宜的减贫路径与措施^[33-34]。高明、唐丽霞 (2018) 运用修正的 FGT 法构建了包含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多个变量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并将其与收入贫困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 99% 的收入贫困户陷入了多维贫困, 而多维贫困中非收入贫困户仅占少数, 两者间存在显著的匹配差异^[35]。张立冬 (2017) 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 通过比较发现相较于收入维度贫困而言, 健康、炊事燃料与教育等非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 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36]。张全红等 (2019) 运用 CFPS 数据, 从静态与动态视域分析了我国农村单维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的关联与差异, 并指出收入

增加不能全面反映家庭的贫困状况的改善,非货币福利的改进通常需要公共服务以及产品的改善^[37]。

2.2.3 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有学者表明,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深入探究相对贫困的致贫诱因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38-39]。关于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系列研究。Bautista and Carlos(2017)使用2011年菲律宾年度调研数据,通过AF双界限法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与家庭规模成正比,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与健康状态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40]。Fu and Akter(2016)使用来自印度的证据表明,移动手机的应用提高了农户掌握新型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性知识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其未来贫困的发生率^[41]。Langmia(2006)研究表明,在南非的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以及电信设施的匮乏,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42]。Batana(2013)通过AF法测度了撒哈拉以南非洲14个国家妇女的多维贫困状况,并按照地区以及指标进行分解,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多维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教育的匮乏是造成贫困的最主要因素^[43]。Álvarez Gamboa et, al.(2021)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发挥减贫效应,个体或家庭可以通过广泛地获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由此提高教育与健康投资、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等^[44]。Joshua et, al.(2017)采用AF法予以估计尼日利亚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指出对MPI的贡献率最高的是生活状况、其次是资产,健康和教育^[45]。

国内关于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划分为宏微观双重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表示,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政府扶持是反贫的关键,一般都是将财政手段与金融工具相结合,而主要的反贫措施仍以公共财政为主^[46]。现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后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差异性特征^[47-48],研究发现邱峰等(2021)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陷入主观相对贫困的概率就越小,其主要是通过降低失业可能性与提高收入满意度两条途径,从而降低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49]。张咏梅等(2022)基于恩格尔理论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发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对外沟通交流等因素是影响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多重并发因^[50]。张林、邹迎春(2021)研究发现,相对

贫困的形成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因素，其中内部原因导致相对贫困的产生，而外在因素则会强化内在因素，进一步加深个体的相对贫困状况^[51]。制度与教育、投资、消费等诸多要素构成了一种“联动机制”，这种联动效应会不断积累，从而导致贫困群体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52]。郭熙保、周强（2016）运用多层回归模型探讨致贫诱因，并发现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与不平的具有显著影响^[53]。造成农村贫困的诱因主要包括地貌类型、自然灾害频次、道路通达率以及劳动力文化素质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54]。自然地理环境的约束是部分农村地区陷入相对贫困的重要诱因，其产业发展受限致使村民经济收入匮乏，社会功能不足促使村民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充分^[55]。

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户主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规模、户籍类型与经济状况等对多维相对贫困存在显著影响^[56]。朱晓、秦敏（2020）运用2014年CMDS数据，通过多种模型，研究发现流动范围、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等均会对流动人口相对贫困产生影响^[57]。杨帆、庄天慧（2018）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视角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形成机理，发现父辈的政治禀赋对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具有差异性影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状况、职业素养、语言技能等因素对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8]。彭新万、张承（2022）基于可行能力视域，从收入、福利、政治权益与社会机会等构建城镇相对贫困指数，发现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滞后、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受教育水平、观念落后以及劳动力资本不足等因素均会促使居民难以挣脱相对贫困的桎梏^[59]。罗明忠等（2020）基于河南省调研数据，以货币收入匮乏与多维指标剥夺同时测算农户相对贫困水平，研究发现无论按照哪种相对贫困测度方式，非农就业技能培训与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均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60]。郑时彦、王志章基于主观相对贫困视角，运用PSM法发现，参与社会保障能有效缓解居民相对贫困，并且相较于未参保居民，参保群体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3.13%^[61]。栾江、马瑞（2021）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模型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予以探析，研究指出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信任与互惠关系等社会资本积累均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状况^[62]。聂荣、苏剑峰（2020）基于CFPS数据研究发现，家庭受教育人数比例、健康人口比例、抚养比与在职人口比例对农户陷入贫困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63]。仲超、林闽钢（2020）通过 2018 年 CFPS 数据探析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诱因以及剥夺状况，结果表明，其主要被剥夺的是教育与健康，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户籍制度等均会对相对贫困产生显著影响^[64]。朱晓、段成荣（2016）运用相关数据，探析农民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主要从事职业及流入地区差异均对其相对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65]。左孝凡、陆继霞（2020）指出互联网信息技术运用有益于提高农户的教育可及性、非农就业概率以及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缓解其相对贫困状况^[66]。谭燕芝等（2017）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支持有益于改善农户的福利水平，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67]。

2.2.4 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研究

相较于国内，国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但却同样有流动工人的存在，比如国内流动与跨国流动工人。国外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发生时间比中国要早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主要源于工业革命后，城市更高的劳动回报率、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促使大量农村人口以及海外移民涌入主要工业城市谋生，而在流入城市后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凸显，移民贫困问题随即产生。有学者认为，移民的迁移行为不益于贫困的减缓，Ivanová and Grmanová（2021）指出，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很高，相较于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而言，其更具有吸引力，但在就业方面，跨国迁移劳动力并不总是能实现充分就业，致使移民在迁入国容易陷入社会排斥，其社会状况促使其陷入贫困风险加大，在诸多欧盟国家中，移民群体陷入贫困风险以及社会排斥的概率高于本国居民^[68]。Gustafsson et al.（2021）通过分析在 2010 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移民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得出相似结论，其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移民，流入丹麦和瑞典后，其贫困发生率远高于相同年龄段内的本地居民^[69]。但 Lokshin et al.（2010）利用 1995—2004 尼泊尔数据，研究发现，跨国迁移以及往家乡汇款会降低大致 20% 贫困发生率，如果没有发生迁移，则会促使尼泊尔贫困率由 30% 增加至 33.6%^[70]。也有学者指出城市的发展也有益于贫困的减缓^[71-72]。

步入全面小康时期，绝对贫困已让步于相对贫困，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相对贫困问题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且普遍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共同富裕进程中重

点聚焦对象^[73]。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相对贫困的多维性以及动态性特点,已有学者主要围绕经济贫困、权力贫困、健康贫困、能力贫困对农民工在城剥夺状况予以梳理。经济贫困是相对贫困的外在表征形式,叶普万(2013)通过微观调研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工资水平、住房情况以及社会保障状况都与之存在显著差距^[74]。李实、吴彬彬(2020)运用多套微观调研数据探析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间福利水平差异,研究发现尽管两者的工资收入差距呈逐年递减趋势,但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仍明显高于农民工^[75]。何凌霄、吴海江、张忠根(2015)指出,相较于本地农民工,外地农民工更具备收入优势,在缓解选择性偏误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76]。王美艳(2014)基于消费视角发现,农民工生活消费总量与城市居民相当,但其食品、医疗与文娱消费却与城市居民间存在明显差异^[77]。王建英等(2020)运用2015年住户调查数据探析农民工贫困状况,发现农民工更容易陷入消费剥夺的窘境^[78]。

教育与健康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其有效发挥了减贫效应,但农民工群体通常由于其受教育水平低下、职业技能欠缺以及医疗保障支出不足等,致使其人力资本匮乏,难以脱离贫困陷阱。王春超、叶琴(2014)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劳动者,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后者的教育贫困发生率始终高于前者^[79]。陈志钢等(2019)指出,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低,若考虑其子女就业等面临的障碍,农民工的教育贫困以及由此所引致的教育差距的代际传递问题也会由此显得更为严峻^[80]。杨舸(2017)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庭陷入相对贫困,其不仅体现在以货币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指标,还表现在教育、住房等资源享有的匮乏^[81]。基于健康人力资本而言,李建民等(2018)指出,在初入城市时,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并无明显差异,但随着务工时间增长,“健康损耗因素”使农民工的健康优势逐渐消损直至差于城镇居民^[82]。由于信息渠道匮乏、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相较于本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容易陷入生殖健康风险^[83]。

为有效促使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动力与可行能力开展了大量研究。祝仲坤等(2020)基于Sen的福利思想,从防护性保障、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等测度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结果表明目前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水平较低^[84]。郭郡郡、刘玉萍(2019)同样发现,当前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水

平较低，且各功能性活动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整治社会参与度较低^[85]。葛笑如（2012）指出，经济收入匮乏、可行能力缺失是农民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诱因，人力资本匮乏与社会排斥是农民工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且应通过提升社会包容度以此缓解农民工贫困状态^[86]。

2.2.5 研究评述

概括而言，以上研究成果为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借鉴。首先，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空间分异的关注较少，对于地域辽阔的中国而言，各地理区位上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差异性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其次，目前该主题的空间视角研究大多是从国家或省域层面出发，难以全面反映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特征。因此，需要构建多维度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精准识别与测度农民工群体的在城相对剥夺状况及其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趋势，从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减贫方略与具体措施。

3 我国城市农民工相对贫困概况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城市层面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相关文件材料。本文所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数据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是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所组织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该调查通过 PPS 方法，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调查对象涵盖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且为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 岁以上人群。相较于其他数据而言，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是研究农民工相关问题的权威性数据^[87]，其涵盖的农民工个体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信息较为全面。本文参考现有文献，构建了包含经济条件、自我发展以及生活保障三维度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问卷内容在调查初期并未达成统一，部分问题设置与本文指标选取存在出入，因此，通过参考已有文献以及结合数据可及性，选取 2014—2018 年作为本文的研究时段。

3.2 经济条件现状

本章选取 2018 年数据，参考现有文献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与生活保障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生活现状予以统计^①，并将其与当地城镇劳动者予以对比，以期了解农民工的在城生活质量。经济水平方面（见图 3.1（a））^②，与城镇劳动者相比，农民工的家庭月收入与消费相对较低，家庭收入与消费低于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农民工家庭占比均高于城镇劳动者。就业质量方面（见图 3.1（b））^③，农民工与就业单位签订正规劳务合同的占比为 60.53%，城镇劳动者签订正规合同占比为 78.49%，农民工稳定就业占比明显低于城镇劳动者。由于户籍制度限制、社会歧视与劳动力分割等因素影响，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仍然存在隐形的沟壑，农民工群体通常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以非技术的工人阶层为主，而

^① 经济条件包括经济水平与就业质量；自我发展包括教育水平与健康状况；生活保障包括社会保障。

^② 经济水平包括家庭收入高于流入城市平均水平占比（Highsr）、家庭收入低于流入城市平均水平占比（Lowsr）、家庭消费高于流入城市平均水平占比（Highxf）、家庭消费低于流入城市平均水平占比（Lowxf）。

^③ 就业质量包括有固定期限合同占比（Gdht）、无固定期限合同占比（Wgdht）、完成一次性工作占比（Ycrw）、试用期占比（Sy）、未签订劳动合同占比（Wqht）。

城镇居民则主要以技术密集型就业为主,从而致使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农民工家庭在城仍处于经济相对劣势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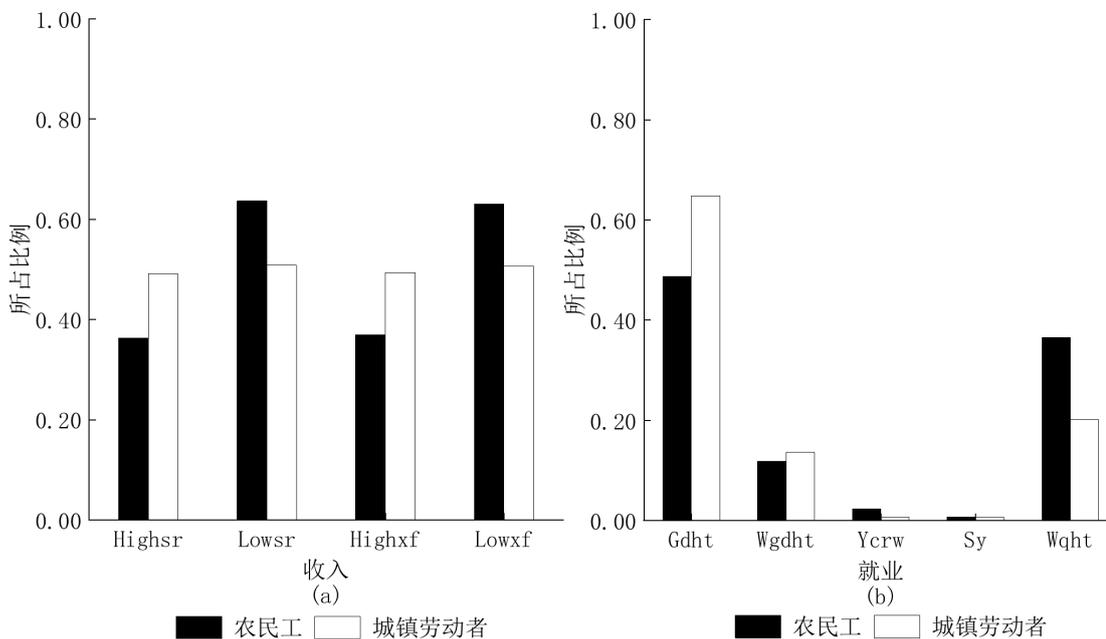


图 3.1 经济条件状况

3.3 自我发展现状

教育水平方面^①,由图 3.2 (a)可知,在城务工的农民工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中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占比为 16.02%,小学占比为 14.01%,人力资本较高水平的农民工占比也相对较低,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16.12%,其中大专学历占比为 10.88%,城镇劳动者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占比为 3.4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51.62%,其中大专与本科劳动者占比为 48.86%。由于城乡教育培训与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农民工在乡村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仍相对较低,45.46%的农民工为初中学历,相较于城镇劳动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仅为城镇劳动者的 31.23%,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难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相应的生产资料与劳动报酬。健康状况方面^②,由图 3.2 (b)可知,进城农民工在当地社区建立健康档案与接受健康教育的比重分别为 33.58%、71.80%,城镇劳动者对自身健康关注度均高于进城农民工,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健康档案的属地政府难以

^① 教育水平包括未上过学占比(Wm)、小学占比(Xx)、初中占比(Cz)、高中占比(Gz)、本科占比(Bk)、研究生占比(Yj)。

^② 健康状况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占比(Jkda)、接受健康教育占比(Jkfy)。

为其开展健康管理、传染病防控等基本卫生服务项目，致使农民工群体对自我健康了解程度与接受健康教育水平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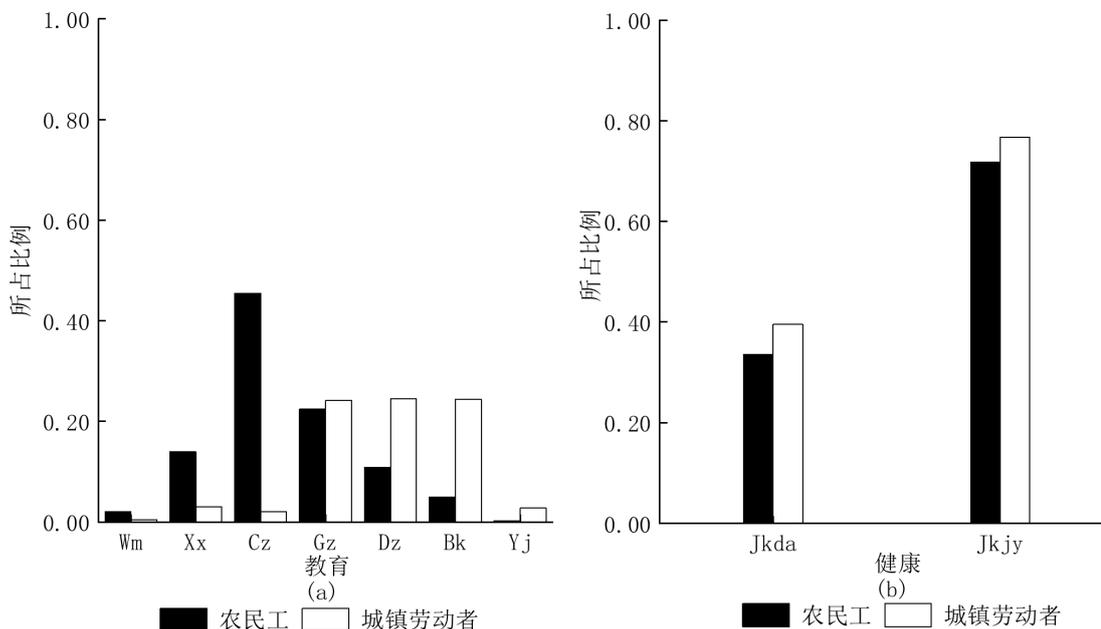


图 3.2 自我发展状况

3.4 生活保障现状

图 3.3 汇报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情况差异^①，结果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达到 79.09%，进一步测度发现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率为 67.37%，由于保险费用缴纳以及就业的非稳定性，致使进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主要来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占比仅为 30.48%、2.86%，融入城镇相关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尽管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的费用缴纳较低，但其通常要求被保者返回家乡指定诊所或医院就医，且报销比例较低，程序较为繁琐，农民工日常在城的医疗服务需求仍然较多，从而加重了其在城医疗负担。相较于城镇劳动者，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障卡的比重为 53.57%，为城镇劳动者比重的 72.56%，可见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仍然存在缺陷。

^① 社会保障包括参加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占比 (Xnh)、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占比 (Cxy)、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占比 (Czy)、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占比 (Chz)、参加公费医疗保险占比 (Gfy)、办理社会保障卡占比 (Sb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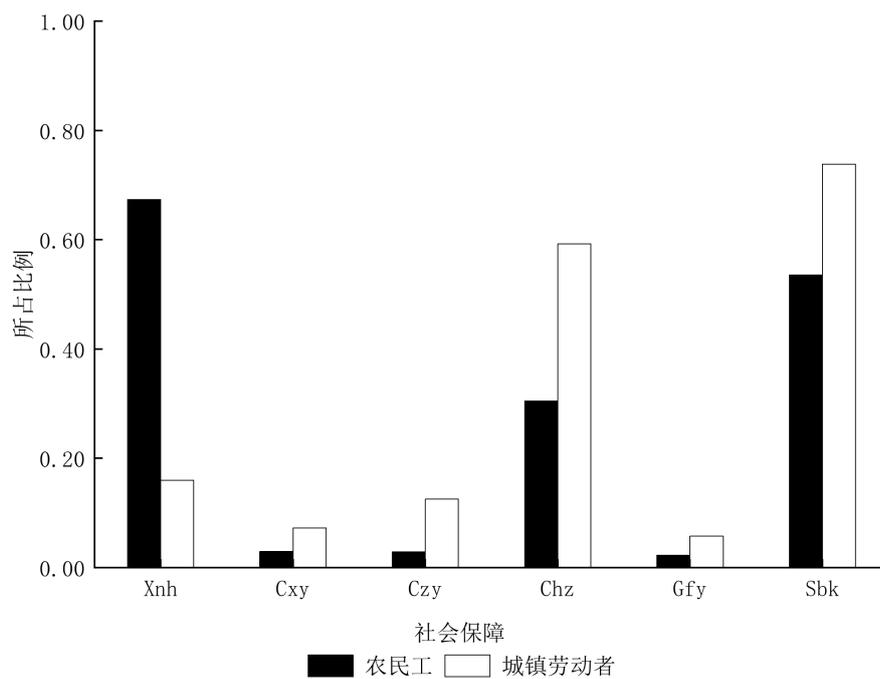


图 3.3 生活保障状况

4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4.1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4.1.1 多维相对贫困的 A-F 测度方法

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以“双界限法”作为测度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分析方法。第一层界限为识别农民工在各维度是否被剥夺，第二层界限通过被剥夺的维度数来判定农民工是否处于多维相对贫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依据贫困指标筛选相关变量，从而构造一个 $Y_{ij} = N \times D$ 的多维矩阵，其中， N 表示样本数量， D 表示剥夺指标， Y_{ij} 则表示个体 i 在指标 j 下的取值 ($1 \leq i \leq N, 1 \leq j \leq D$)。

其次，根据贫困指标的剥夺临界值，判断个体 i 在指标 j 下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Z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剥夺临界值，当 $Y_{ij} \leq Z_j$ 时，个体 i 在指标 j 上属于相对贫困，并赋值为 1，反之为 0。利用剥夺临界值对所有个体各维度矩阵予以判断，并转化为 $g^0 = N \times D$ 的剥夺矩阵 (g^0 取值为 1 或 0)。

再次，依据贫困指标的重要程度赋予其不同的权重大小，继而计算各项指标的 (加权后) 加总指数 $c_i = \sum_{j=1}^D w_j \times g_{ij}^0$ ， w_j 为 j 指标下的权重，大小介于 0—1 之间， c_i 也是同样。设定贫困维度 k ，定义识别函数 $\rho_k(X_i, Z)$ ，识别函数将综合上述识别步骤，依据剥夺临界值 Z ，权重 w 以及贫困临界值 k ，从而判定个体是否为多维相对贫困，当个体为贫困时，识别函数取值为 1，反之为 0。

最后，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PI)。其中， H 表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指数， p 代表多维贫困人口， N 代表总人口，贫困发生率指数计算如 (4.1) 式。

A 表示贫困群体平均被剥夺份额， $c_i(k)$ 表示个体 i 在不同维度 k 下被剥夺的指标数量， p 代表多维贫困人口，贫困平均被剥夺份额计算如 (4.2) 式。由此可以判断，在给定临界限下，多维贫困指数由贫困发生率与贫困深度共同决定。多

维相对贫困指数计算如(4.3)式。参考已有文献做法^[89-91]，在计算出个体农民工的多维相对指数后，运用AF双界限法中的抽样权重加权法，将农民工多维相对数值汇总至其流入城市，从而获得地级市层面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H = \frac{P}{N} \quad (4.1)$$

$$A = \frac{\sum_{i=1}^N c_i(k)}{p} \quad (4.2)$$

$$MPI = H \times A \quad (4.3)$$

4.1.2 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设定

借鉴已有研究，选取经济条件、自我发展、生活保障三个维度六个指标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经济条件维度由农民工在城经济收入水平以及就业稳定性构成。经济收入直接反映了农民工在城的生活质量以及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将收入指标纳入多维相对贫困评价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既有以人均纯收入识别贫困的扶贫政策，也有效衔接了共同富裕进程中相对贫困识别的特征，借鉴已有学者做法，选择农民工所在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0%作为收入相对贫困指标^[88]。除了收入，本文还考虑了农民工在城就业的稳定性因素^[89]，收入是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就业则是收入获取的主要渠道，稳定性就业有益于降低农民工的高频流动性，提升市民化意愿，进而安居乐业，而非稳定性就业使农民工工作变更频繁、劳动时间持续较短，难以实现职业技能与工作经验积累，使其被迫长期就职于低层次职业岗位，收入风险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回流返乡，因此，选择农民工在城是否在被询问调查的前一周做过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以此反映其在城就业稳定性。

自我发展维度由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况构成。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反映了其在城的受教育情况，也是其人力资本水平的具体表现，且受教育程度通常也是在城就业的准入门槛，学历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可以有效运用互联网资源与社交平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升自身素养与人力资本水平积累，以此提高在城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实现转岗换位，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换，同时较高素养的农民工群体也会重视其子女教育的投入，从而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选择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作为其人力资本的直接体现，并以九

年义务教育作为高低教育水平的分界点。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农民工实现阶层跨越的基本能力，健康问题损耗会使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健康档案设立与健康教育接受不仅能反映农民工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情况，更能体现农民工对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因此，本文选取农民工是否在流入地构建健康档案以及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作为健康维度的指标，以此反应其健康状况^[90]。

在生活保障上，农民工群体通常受到户籍以及固有观念影响，其难以获取或不意愿购买医疗保险与办理社会保障卡，而医疗保险的参与不仅可以作为提高农民工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更能增加其就业预期，缓解金融约束。未拥有社会保障会降低农民工的风险承担能力，提高其在城的生活成本，使其陷入被剥夺的窘境。因此本文纳入了是否拥有社会保障作为衡量指标^[91]。

关于多维相对贫困的权重设定，较为常见的权重设置方法有：频率法、统计法和规范法。频率法主要通过各指标的出现频率来确定权重；统计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规范法主要采用维度等权重或指标等权重的设置方法。先有文献大多采用规范法设置权重从而研究群体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因此，本文选取常用的等权重方法。等权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维度等权重，另一种是指标等权重。为了防止测量结果偏向个别维度或指标，本研究采用维度等权重，维度内指标等权重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各个指标的具体含义、剥夺临界值及其权重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与剥夺临界值界定	权重
经济条件	收入	年收入低于同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50%，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6
	就业	“五一”前一周没有做过 1 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6
	教育	受教育年限低于 9 年，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9
自我发展	健康	未接受过健康教育，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9
		未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9
生活保障	保障	没有任何一项社会保障，判断为相对贫困，赋值为 1	1/3

4.2 整体分析

4.2.1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析

首先从整体出发,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与分解。由表 4.2 可知,从时间变化上看,2014—2018 年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整体情况得以明显改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强度指数与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别从 0.232、0.475、0.110 下降至 0.142、0.441、0.063,降幅分别为 38.79%、7.16%、42.73%。分时段看,除多维相对贫困强度指数保持下降趋势外,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与多维相对贫困综合指数都相继在 2015—2016 年略微提升,随后下降,其呈现倒“N”形曲线分布特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面临宏观经济不景气、落后产能过剩与制造业利润下降等诸多因素叠加,农民工所主要从事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发展趋缓,就业稳定性下降,工资收入增长乏力。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也对务工人员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变相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务工的就业门槛,致其长期游离于正规就业之外,加之户籍制度与落户门槛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福利被剥夺的可能性,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提高。随着就业服务范围不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逐步提高,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必将得以不断缓解。

表 4.2 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

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H)	0.232	0.122	0.169	0.160	0.142
多维相对贫困强度指数 (A)	0.475	0.454	0.445	0.441	0.441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PI)	0.110	0.055	0.075	0.070	0.063

4.2.2 维度与指标分解

从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各维度来看(见图 4.1 (a)),生活保障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于 2018 年达到低谷;经济条件与自我发展维度的贡献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于 2018 年达到峰值,分别由 0.092、0.438 上升至 0.165、0.520,涨幅为 79.35%、18.72%,且贡献度最高维度由社会保障转向自我发展。

对各维度指标影响贫困指数的作用分解可见,其贡献度存在显著差距(见图 4.1 (b))。在居民增收方面,收入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贡献度多年来维系在较低水平,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再成为其

陷入先对剥夺的主要因素，反之，其就业状况却仍不容乐观，由2014年0.086上升至2018年0.146，涨幅达69.77%，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歧视等多重因素，农民工普遍面临在城的高就业门槛，相较于城镇居民而言，其通常从事自雇、无劳务合同等非正规型就业，就业门槛与就业稳定性较低，过劳工作与“同工不同酬”现象并存，致使其更容易陷入就业状况被剥夺的窘境。在自我发展能力方面，2014—2018年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被剥夺由0.087上升至0.142，涨幅为63.22%，这说明，企业转型与产业升级所需的就业门槛提高，而农民工通常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相较于城镇居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健康指标被剥夺状况保持在10%的微弱变化区间。社会保障指标方面，其贡献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反映不断投入的社会保障资金、不断加强的权益维护和不断改善的外部环境，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以及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而提高了农民工的风险抗压能力，使其因社会保障匮乏而陷入被剥夺窘境的状况得以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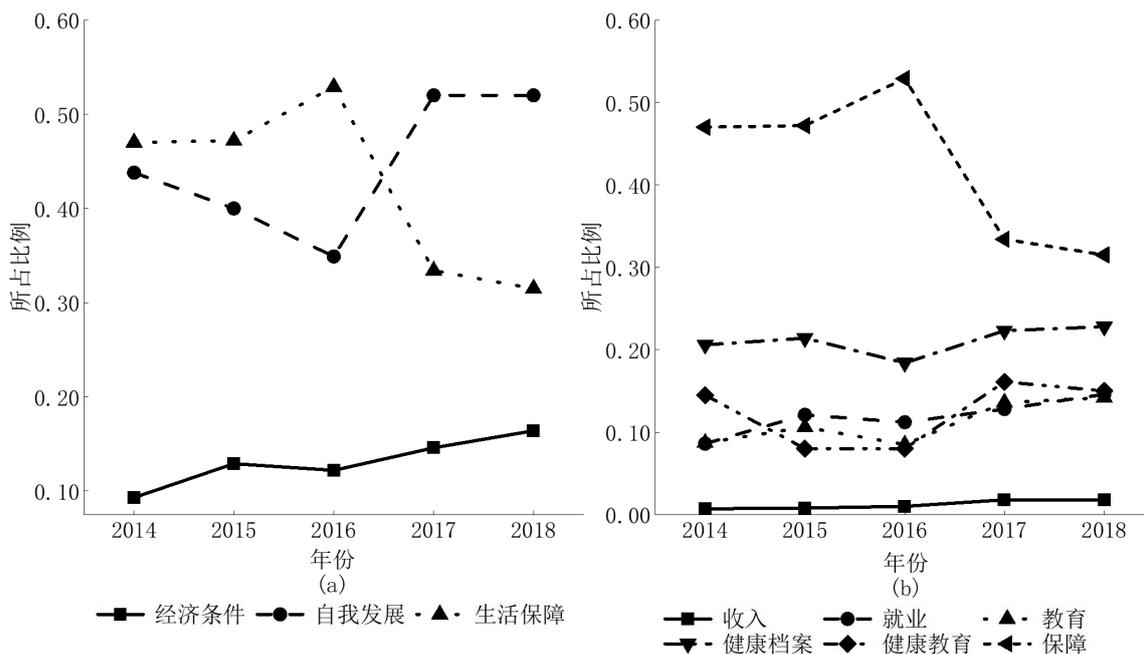


图 4.1 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维度与指标分解结果

4.2.3 贫困阈值分析

通过改变多维贫困的临界值，予以观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发生率以及强度的变化趋势。当 $k=0.3$ 时，即在 3 个维度中，至少存在 1 个维度陷入相对

贫困，以此类推。由图 4.2 (a) 与 4.2 (b) 可知，从横向时间节点比较来看，随着贫困阈值不断扩大，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发生率与强度均得到显著改善。以 2014 年作为时间节点（见图 4.2 (a)），横向阈值比较来看，随着 k 值增加，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由 0.868 下降至 0.002，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由 0.246 山升至 0.842，综合反映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由 0.214 下降至 0.002，降幅为 99.07%，即随着贫困阈值范围扩大，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贫困剥夺强度显著提高，在二者作用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得以显著缓解。显然，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状况是超越单一收入维度且更具多元性的复杂问题，单一维度的衡量标准难以准确反映农民工在城的发展危机与生活状况，从多维视角则可更加精准识别与制定应对措施，进一步从空间视域探究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分布状况，从而使各城市因地制宜地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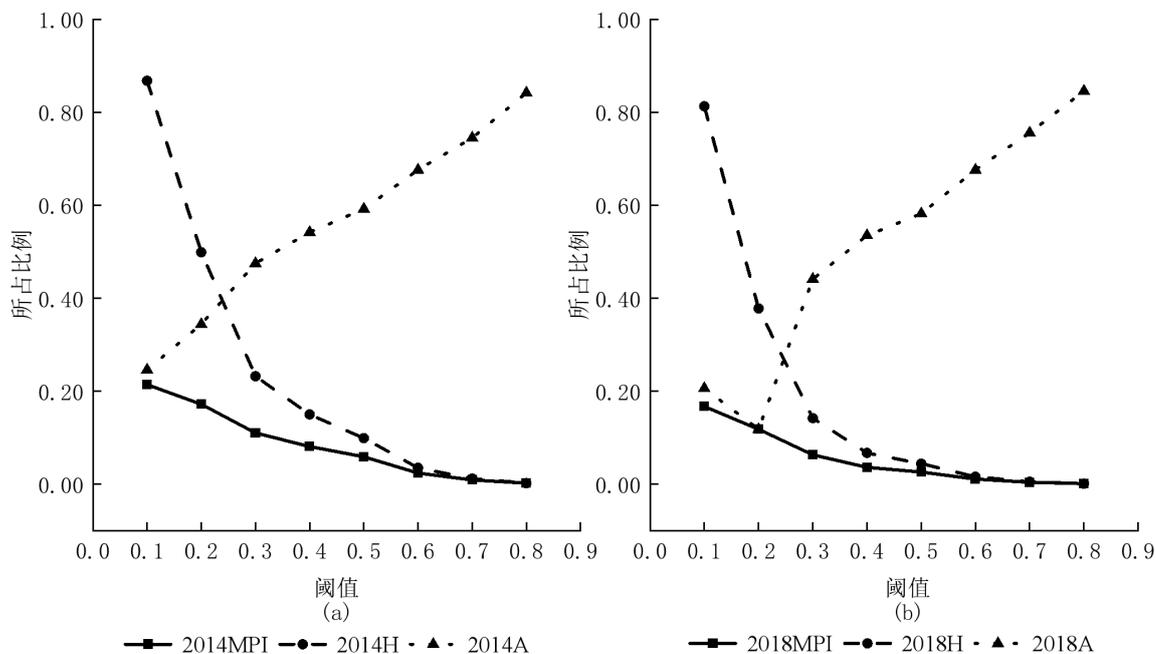


图 4.2 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阈值测度结果

4.3 空间分布特征

4.3.1 三大区域尺度分析

为了更直观反映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 2014、2018 年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运用 ArcGIS10.7 与 Origin 软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 265 个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由低到高划分为低值、次低值、次高值

及高值区四种类型，并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城市群、城市等多尺度反映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从三大区域^①尺度看（见图 4.3），2014—2018 年，东部地区以次高值区为主转变为以低值区为主，低值区占比由 17.24% 上升至 39.08%，次高值区占比由 49.43% 下降至 27.59%，农民工相对贫困状况得以显著改善；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较低，城市农民工贫困类型均以低值区占比为主，且 2018 年低值区占比均突破 50%。一方面得益于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切实为农民工群体带来了福利改善，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占比较高，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区域竞争效应促使政府与企业实施福利改进措施，农民工福利待遇得以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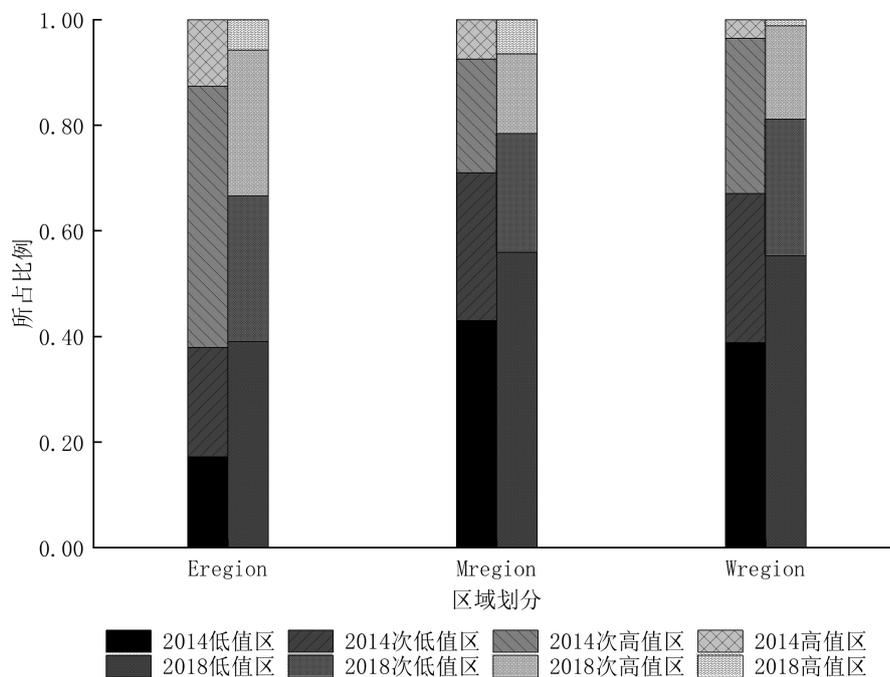


图 4.3 不同区域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占比

同类型占比中（见图 4.4）^②，东部地区低值区占比由 17.05% 上升至 25.56%，上升 8.51 个百分点，且次高值与高值区在同类型占比中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中部地区低值与次低值区占比均有微弱下降趋势，次高值与高值区占比均有所上升，其分别提高了 3.69 与 16.67 个百分点，但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除黑龙江、吉林、山西省的少数城市外，中部地区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仍保持较低

^① 东部地区（Eregion）、中部地区（Mregion）、西部地区（Wregion）：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 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1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数据）。

^② 低值区（Low）、次低值区（Sublow）、次高值区（Subhigh）、高值区（High）。

水平，究其原因可能为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实施切实为农民工群体带来了福利改进，同时中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较高，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由此所产生的区域竞争效应促使政府与企业实施福利改进措施，从而增强区域的吸纳能力，由此使中部地区农民工相对贫困指数较低；西部地区同中部地区贫困转移情况相似，低值与次低值区占比呈现微弱变化，高值区占比由 14.29% 下降至 8.33%，下降 5.96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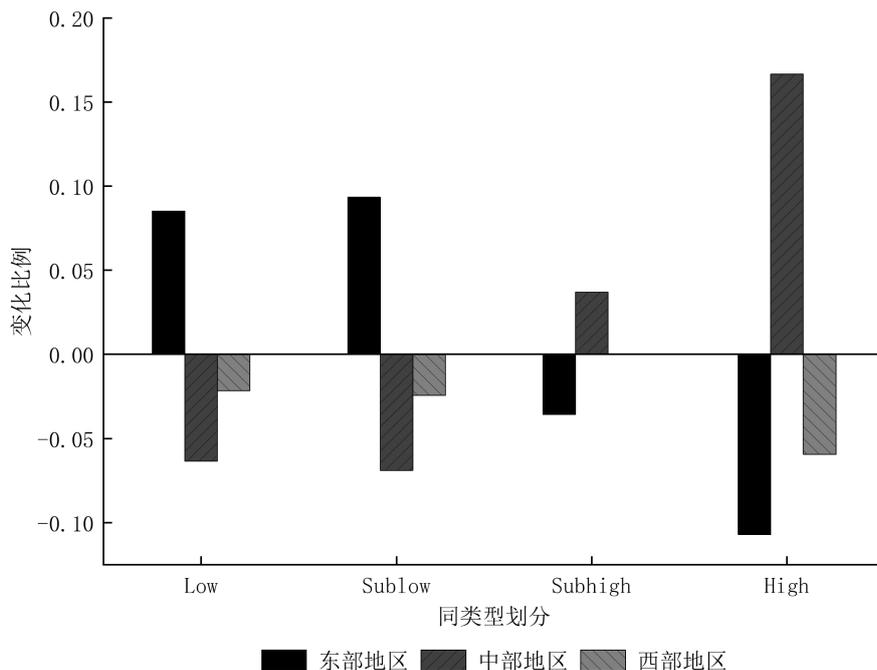


图 4.4 不同区域多维相对贫困同类型分布占比

如图 4.5 所示，呈现了三大区域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变异系数。结果发现，2014—2018 年，各区域间变异系数处于反复波动的非稳定态势，且呈现出“中部>西部>东部”的演变趋势。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呈波动收敛趋势，分别由 2014 年的 0.493 和 0.621 下降至 2018 年的 0.395 和 0.250，表明地区内部贫困指数呈现出差异缩小的趋势；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阶段特征，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反映出地区内部贫困差异的强烈变动，这与中部各省市间经济存量与资源禀赋差异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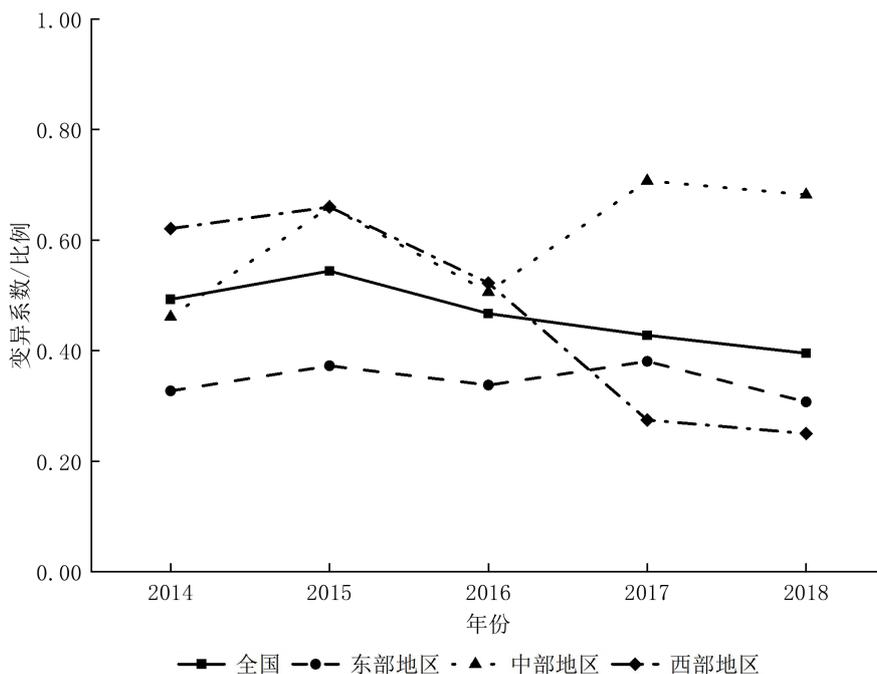


图 4.5 不同区域变异系数分析

4.3.2 城市群尺度分析

城市群尺度包括 5 个国家级城市群、8 个区域性城市群、6 个地区性城市群^①。由图 4.6 可知，2014—2018 年，国家级城市群中，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贫困类型占比由次高值与高值区为主转变为以低值区与次低值区为主，总占比分别由 46.16%、6.25%、33.33% 上升至 69.23%、68.75%、88.89%，上升 23.07、62.50、55.56 个百分点，成渝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贫困指数仍维系在较低水平；区域性城市群中，山东半岛、关中平原、北部湾与天山北坡城市群相对贫困状况显著改善，均向以低值区或次低值区为主转变，中原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地区性城市群中，呼包鄂榆城市群未发生贫困类型转移，黔中与兰西城市群低值区占比提升，而晋中、滇中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加剧趋势，次高值与高值区占比明显提升。多数城市群相对贫困状况得以显著改善，其中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农民工主要集聚城市群的贫困改善幅

^①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 19 个城市群为案例区，其中，国家级城市群 5 个：京津冀城市群（JJJUA）、长三角城市群（CSJUA）、珠三角城市群（ZSJUA）、成渝城市群（CYUA）、长江中游城市群（CJZYUA）；区域性城市群 8 个：山东半岛城市群（SDBDUA）、中原城市群（ZUYA）、关中平原城市群（GZPYUA）、海峡西岸城市群（HXXAUA）、北部湾城市群（BBWUA）、哈长城市群（HCUA）、辽中南城市群（LZNUA）、天山北坡城市群（TSBPUA）；地区性城市群 6 个：晋中城市群（JZUA）、呼包鄂榆城市群（HBEYUA）、黔中城市群（QZUA）、滇中城市群（DZUA）、兰西城市群（LXUA）、宁夏沿黄城市群（NXYHUA）。

度相对较大，这与其内部各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密切相关，依托地缘优势与资源共享，使农民工可充分享受中心城市的外溢效应，获取更好发展前景，从而缩小其与城镇居民间的福利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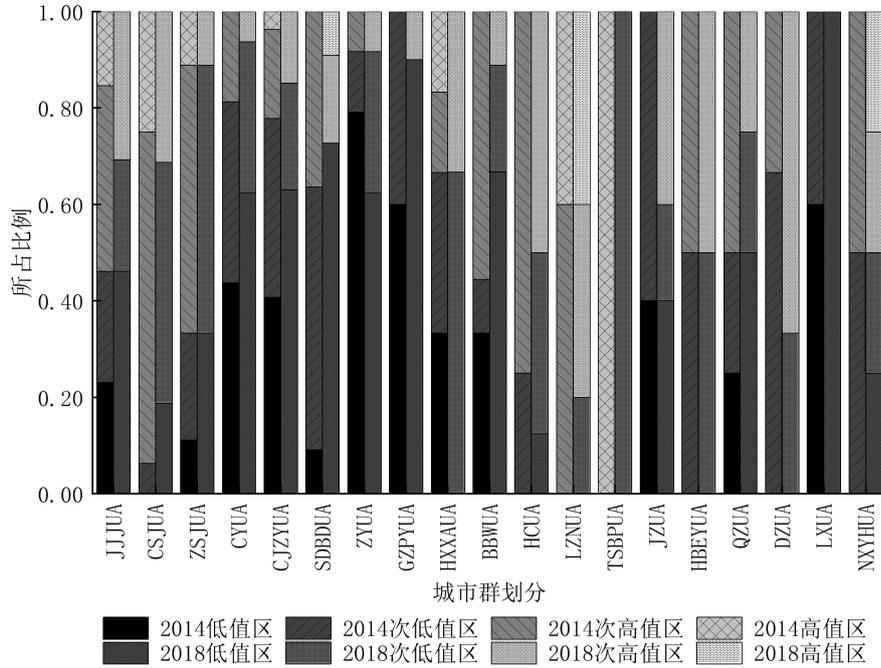


图 4.6 不同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占比

纵向比较来看，低值区同类型占比中（见图 4.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山东半岛、北部湾、哈长、呼包鄂榆、滇中及兰西城市群的占比均有所提升，中原城市群的低值区同类型占比由 32.20%下降至 16.67%，下降幅度较大；成渝、关中平原、海峡西岸、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占比浮动均在 10 个百分点内，变化较微弱；次高值区占比重心则由长三角城市群向辽中南城市群转移，辽中南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程度相对恶化。可见，东南沿海、西北、西南内陆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中部城市群仍保持较低水平的贫困状况，东北城市群部分城市贫困状况呈恶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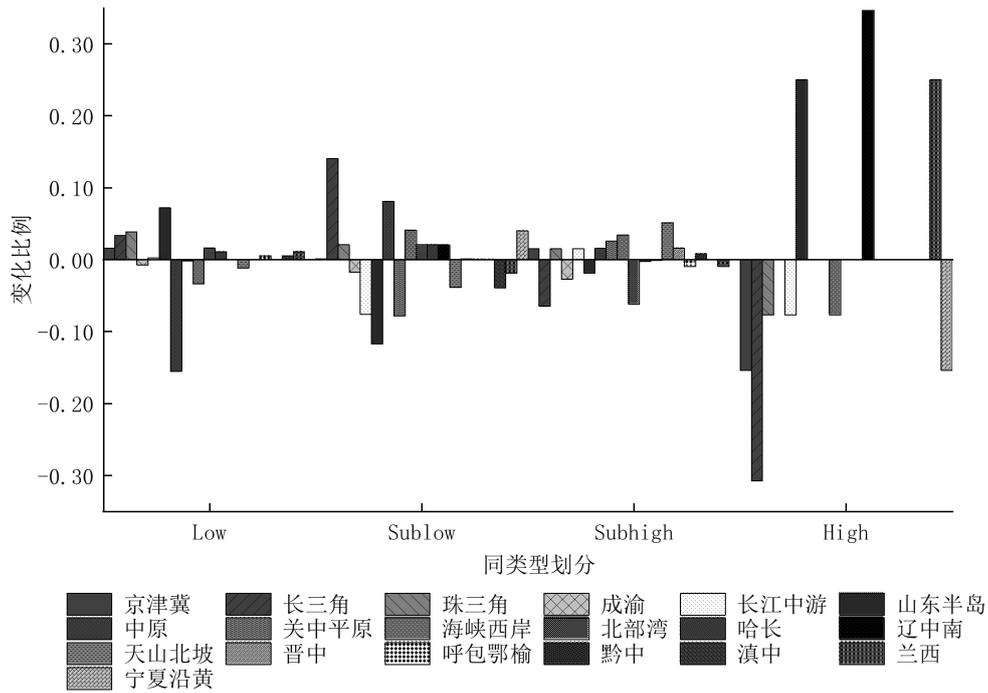


图 4.7 不同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同类型分布占比

4.3.3 城市尺度分析

将 265 个城市依据人口规模予以划分,并分别计算各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与所处贫困类型^①。由图 4.8 可知,2014—2018 年,超大与特大城市贫困次高值与高值区持续缩减,且分布重心表现出向次低值区转移趋势,其中汕头市、广州市与深圳市贫困改善幅度较大;大城市与小城市贫困次高值与高值区占比由 40.5%缩小至 16.53%,且分别向以低值与次低值区为主转移;中等城市贫困低值区占比超过 50%,但次高值与高值区变化幅度均在 2 个百分点内,部分相对贫困严重城市仍未发生贫困类型转移且表现出进一步深化趋势,如辽阳市与松原市。

^① 超大城市(常住人口 \geq 1000 万, Cdcities)、特大城市(常住人口 \geq 500 万, <1000 万, Tdcities)、大城市(常住人口 \geq 100 万, <500 万, Dcities)、中等城市(常住人口 \geq 50 万, <100 万, Zacities)、小城市(常住人口<50 万, Xc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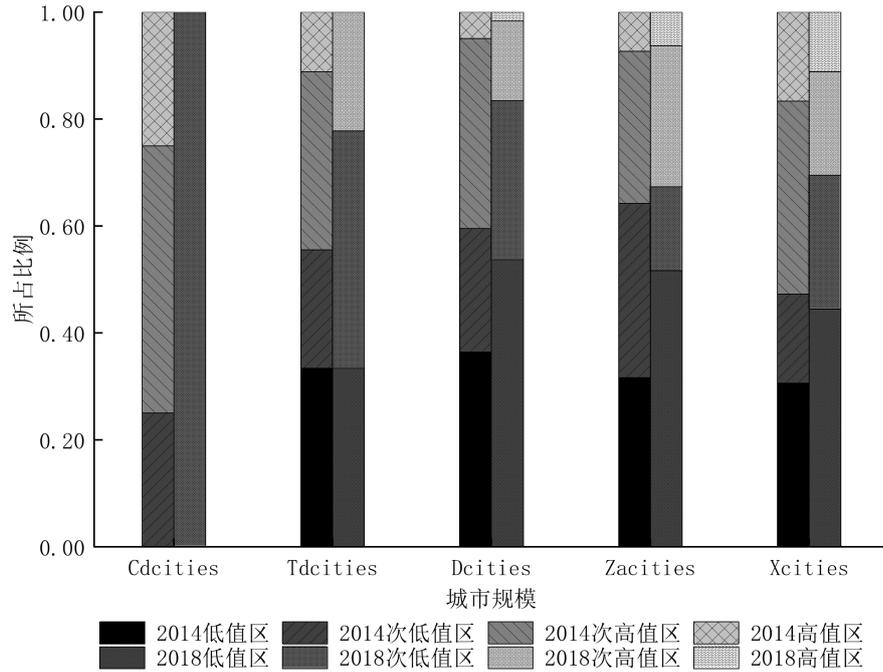


图 4.8 不同规模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占比

纵向比较来看（见图 4.9），次低值区同类型占比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与小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上升，分别上升 4.41、2.94、11.76 与 4.42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随着大城市户籍政策不断放宽，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在流入地实现安居乐业，推动人口和经济集聚，从而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与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大城市同样也可提供更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使规模较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状况得以改善，而对于规模小的城市而言，其享受政策偏向，农民工就近务工就业得以满足，从而实现就近市民化，生活品质与保障情况得以改善，然而受制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致使农民工获得的福利效应也由此受到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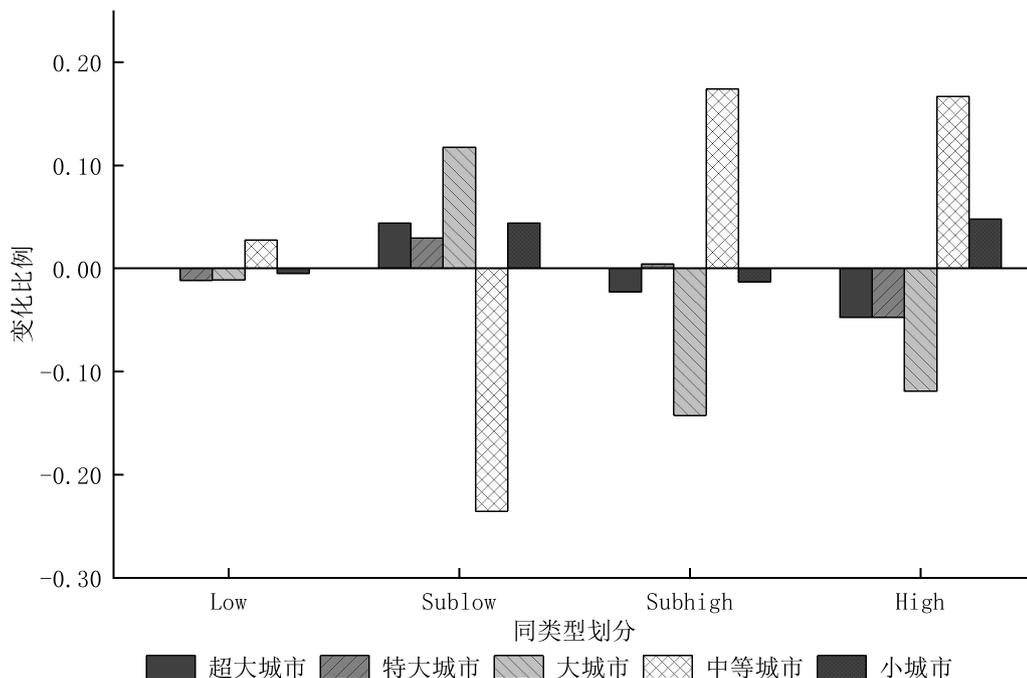


图 4.9 不同规模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同类型分布占比

将样本城市依据行政等级予以划分，进而统计不同等级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及演变趋势^①。横向比较来看（见图 4.10），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贫困低值区与次低值区占比均有所提升，高值区与次高值区城市明显减少，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显著缓解，其中，厦门市、广州市、青岛市及深圳市改善幅度较大；普通地级市低值区占比明显提升。概言之，规模大等级高的城市成为农民工务工的首选地，但是由于制度、经济以及文化壁垒，致其收入提升与福利改进受阻，随着户籍制度不断放宽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福利差距不断缩小，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得以缓解。

^① 行政等级划分：直辖市（Zxcities）、计划单列市（Jhdlcities）、副省级城市（Fsjcities）、省会城市（Shcities）、普通地级市（c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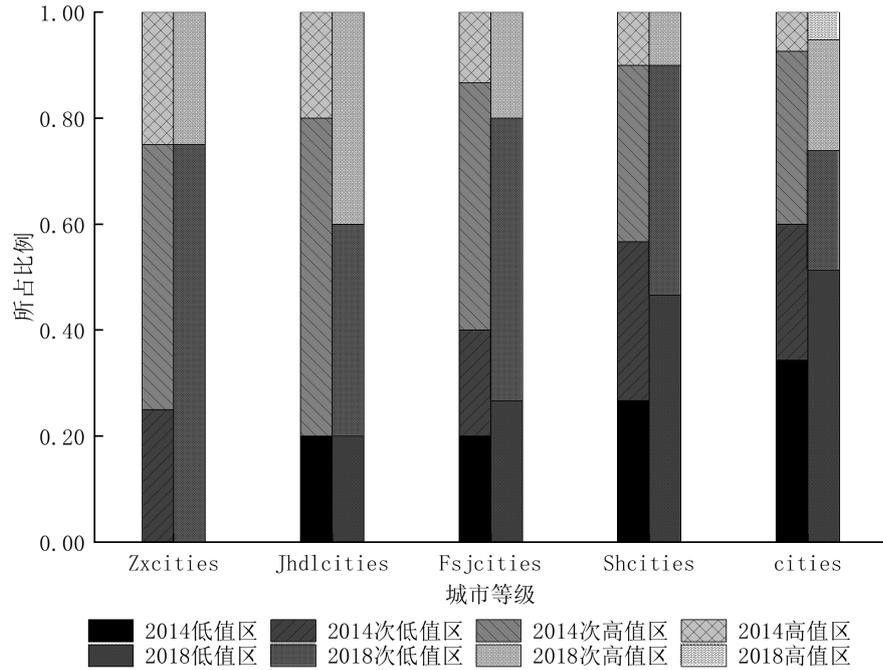


图 4.10 不同等级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占比

纵向比较而言（见图 4.11），普通地级市次低值区同类型占比由 81.94%下降至 66.67%，下降 18.64 个百分点，其分别向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与省会城市转移，而贫困次高值与高值区则进一步向普通地级市集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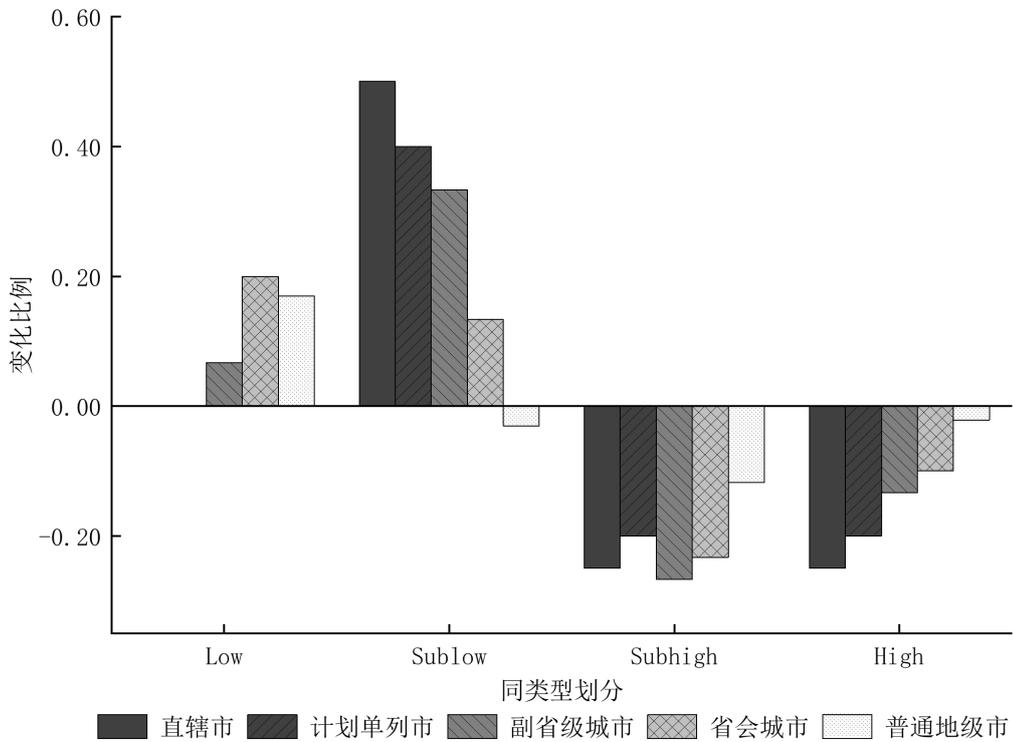


图 4.11 不同等级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同类型分布占比

4.3.4 贫困演变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各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动态演变情况,运用 Matlab 软件通过马尔科夫转移矩阵予以测算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发生转移的概率,主对角线数值表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等级未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数值表示贫困等级上升或下降的概率,测算结果如表 4.3 所示。结果显示,2014—2018 年,各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未来改善趋势基本向好。贫困程度较低地区维持原有类型的可能性较高,低值区与次低值区等级保持不变与向低等级转移的概率分别为 50%和 63.67%;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减贫可能性较大,次高值区与高值区向低等级转变的概率为 43.42%和 57.67%,较易发生转移。

表 4.3 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

t/t+1	低值区	次低值区	次高值区	高值区
低值区	50.00	31.72	8.96	9.33
次低值区	29.59	34.08	25.47	10.86
次高值区	21.71	21.71	31.01	25.58
高值区	12.36	16.10	29.21	42.32

4.4 空间关联特征

贫困的发生与交通便利、对外联系度等地理资源禀赋有着密切关联,将空间因素纳入贫困分析有益于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因此,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有学者指出空间单元内某些经济地理现象或属性值与其所处的邻近地区的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有着依赖性与相关性。为此,学术界通常运用空间自相关的研究方法予以探究贫困的空间集聚与变化趋势。

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方法核心,强调数据的可视化性,将研究数据予以统计描述与可视化处理,以此呈现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揭示研究对象间的空间关联模式。ESDA 主要通过全局以及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予以探析研究对象的空间关联模式,全局自相关分析主要探索的是某种属性在整个研究区域中的空间关联与差异性特征,而局部自相关分析所反映的是局部空间的变化性。

4.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利用全局空间莫兰指数予以分析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分布状况,判断其是否在空间上形成集聚或离散现象,常用的方法包括全局 *Moran's I* 和

Geary's C 等。本文对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检验采用全局 Moran's I，其计算公式为：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4.4)$$

n 为研究区域总数量； X_i 代表空间单元 i 的观测值； X_j 代表的是空间单元 j 的观测值； \bar{X} 代表在 n 个研究区域全部观测值的平均值； S^2 为观测值的方差； W_{ij} 为研究对象 i 、 j 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介于 -1.0 到 1.0 之间，在既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莫兰指数绝对值越大则说明空间相关性越强，当莫兰指数等于 0 时，则表示观测属性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即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独立。

运用 GeoDa 软件对 265 个地级市 2014—2018 年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由表 4.4 可知，Moran's I 分别为 0.307、0.372、0.250、0.490、0.190，且 Moran 值的正态统计量 Z 值均大于 1.96，表明 2014—2018 年间 265 个地级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即贫困指数较高或较低的城市趋于集聚，而非完全的随机状态。期间 2017 年与 2018 年 Moran 指数分别达到峰值 0.490 和 0.190 低谷，指数整体变化呈波动式缩小，表明各市贫困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减弱趋势。

表 4.4 全局莫兰指数统计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Moran's I	0.307	0.372	0.250	0.490	0.190
z 值	14.380	18.201	11.911	23.73	9.538

4.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莫兰散点图可以用于研究局部空间的稳定性，且可直观地反映研究单元及其邻近区域间的空间关联形式。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二维图示法，将研究单元的观测值 y 及其邻近区域观测值的加权数据 wy 予以可视化处理，横轴对应变量 y 的所有观测值，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因子 wy 的取值。莫兰散点图被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对应研究单元及其邻近对象间的四种空间关联形式：第一象限（高一高）代

表研究单元与邻近地区同为高值区域，空间差异较小；第二象限（低—高）代表研究单元为低值区域，但邻近地区为高值区，空间差异较大；第三象限（低—低）代表研究单元与邻近地区同为低值区域，空间差异较小；第四象限（高—低）代表研究单元为高值区域，但邻近地区为低值区域，且空间差异较大。

通过 geoda 绘制 2014 与 2018 年莫兰散点图，从而进一步考察各城市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在空间中的集聚模式与显著性。如图 4.12 所示，2014 与 2018 年两个时间段内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状态，且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表现为高一高集聚与低—低集聚。2014—2018 年，高一高集聚型比例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高一高集聚型的多为人口规模大以及行政等级高城市，受制于户籍制度及衍生因素影响，通常对人口的流动具有非完全自由性，但随着户籍制度逐渐放宽、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以及对中低技能的劳动力开展远程网络教育与职业培训，促使农民工加快力资本积累，就业质量提高，整体福利得以改善，从而使其相对贫困状况得以缓解，低—低集聚型分布相对较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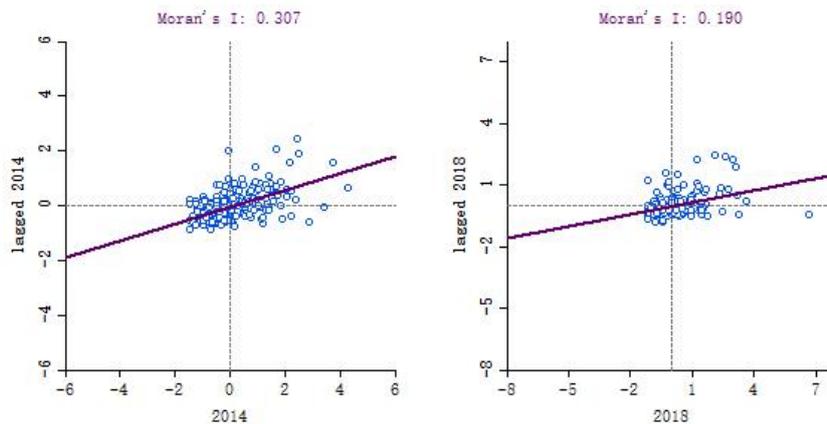


图 4.12 局部莫兰散点图

LISA 集聚图可度量研究单元及其邻近地区属性值间的显著性集聚程度，弥补莫兰散点图没有给出各区域的辐射效应及其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局部莫兰指数。当局部莫兰指数在既定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时，即形成空间集聚。其中，当研究单元及其邻近地区的观测值都属于高值时，即为热点区，可用高一高表示；当研究单元及其邻近地区的观测值都属于低值时，即为冷点区，可用低—低表示；而当研究单元本身观测值与周边地区相反时，即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体现为空间异质性。

统计结果如图 4.13 所示，具体来看，2014 年（见图 a. 2014），高一高集聚

区多集中在黑龙江、辽宁、上海、浙江与江苏等省市；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河南、湖南与湖北等省市；其他位于低—高和高一—低型的城市在空间上呈散点状分布。2018年(见图 b. 2018)，高一—高型区域范围明显收缩，城市总量减，黑龙江与辽宁省成为贫困高值俱乐部，其中包括丹东市、佳木斯市、大庆市；四川、陕西以及河南省形成贫困低值组团片区，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洛阳市等。整体来看，高一—高与低—低集聚区相对稳定，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依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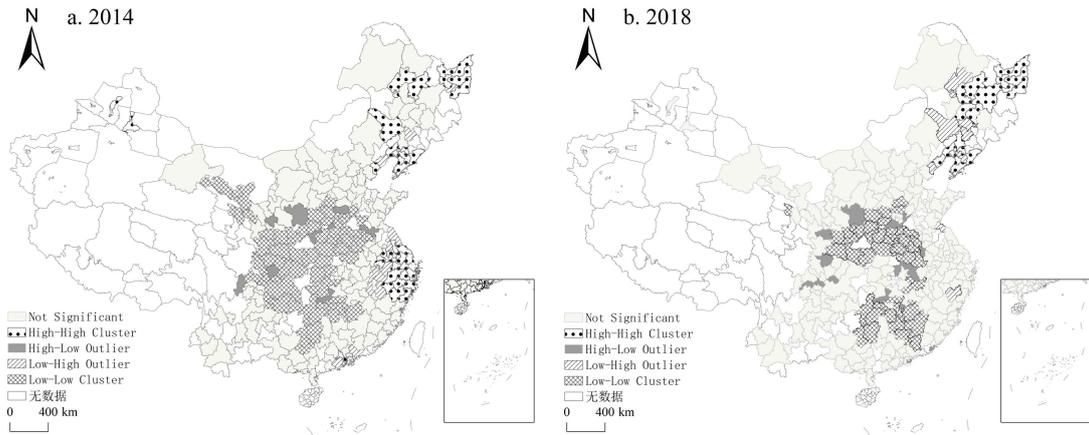


图 4.13 LISA 集聚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 GS(2019)1822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5 影响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因素分析

5.1 模型设定

空间距离相近的事物通常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方法通常假设各研究区域间变量相互独立,且无法考察研究区域与邻近地区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致使回归结果可能出现偏误,而充分考虑了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模型则逐渐成为主流,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只包含误差项的空间交互项,地区间的相互作用是由误差项所引起的,即空间溢出效应是由难以量化的随机冲击造成的。空间滞后模型则在模型中纳入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因子,予以解释邻接地区被解释变量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相较于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则同时纳入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因子,可同时探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在一个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通过 LM、LR、WALD 检验后,本文最终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计量模型如下:

$$MPI_{it} = \delta WMP_{it} + \beta x_{it} + Wx_{it}\lambda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1)$$

式(5.1)中,下标*i*表示各个地级市,*t*表示各个年份,*MPI*为被解释变量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δ 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 β 、 λ 为待估计参数, x_{it} 代表系列影响因素, μ_i 表示空间固定效应, η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5.2 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

5.2.1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第四章测度出的各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用*MPI*来表征。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可划分为内部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农民工个体特征（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Gender）、城市农民工平均年龄（Age）、城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Edu））；农民工家庭特征（城市农民工已婚占比（Marry）、城市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Transpro））。外部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地方政府财政一般支出（Cost））；城市教育水平（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与学生比（Etestudent）、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与学生比（Mtestudent））；城市医疗水平（医院卫生院病床数（Hospbed））；城市信息化水平（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Internet））。

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在生产经营决策方面，男女性别差异尤为明显。通常来讲，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经营决策方式也更为稳健，从而更有助于提升其家庭收入水平，以此摆脱多维相对贫困。本文以流入城市所有男性农民工占比（Gender）用于性别影响因素。

城市农民工平均年龄。年龄越大的户主，其思想观念通常较为传统，难以对时代的发展做出迅速的反应，信息获取渠道较为单一，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为落后，信息不对称性则会进一步加大户主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从而增加农民工家庭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以流入城市农民工平均年龄（Age）用于年龄影响因素。

城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掌握职业技能与学习新鲜事物的时间成本就会越低。这显然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生活状况，降低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本文以流入城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用于教育影响因素。

城市农民工已婚占比。成家立业在传统中代表了一种责任感，已经成家的农民工群体在经营决策中可能会考虑更多情况，以此促进家庭良好发展，避免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窘境^[67]。本文以流入城市农民工已婚占比（Marry）用于婚姻影响因素。

城市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跨省跨地区不仅有益于缓解贫困地区城市管理负担，同时有益于发挥输出减贫效应，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有助于农民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以此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本文以流入城市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Transpro）用于流动影响因素。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就越低。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Cost)表示。

城市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医疗)地区对教育医疗投入将有效加快居民人力资本积累，以此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本文采用普通小学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Etestudent)、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Mtestudent)、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数(Hospbed)予以表示。

城市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高低对信息共享以及应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Internet)作为衡量指标。

5.2.2 数据来源

本章在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用到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相关文件材料，对于个别数据缺失值，采取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为缓解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部分变量作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5.1。

表 5.1 影响因素指标

变量	指标	指标说明	代码
因变量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Y: 城市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PI
自变量	个体因素	X ₁ : 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	Gender
		X ₂ : 城市农民工平均年龄	Age
		X ₃ : 城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	Edu
	家庭因素	X ₄ : 城市农民工已婚占比	Marry
		X ₅ : 城市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	Transpro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X ₆ : 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
		X ₇ : 城市政府财政一般支出	Cost
	城市教育水平	X ₈ : 城市普通小学师生比	Etestudent
		X ₉ : 城市普通中学师生比	Mtestudent
	城市医疗水平	X ₁₀ : 城市医院、卫生院病床数	Hospbed
	城市信息化水平	X ₁₁ : 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Internet

5.3 回归结果分析

5.3.1 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莫兰系数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考虑时间与空间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首先,采用一阶反距离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对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豪斯曼检验,且通过1%统计显著性检验,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①。其次,通过运用LM、LR与Wald检验予以判断SDM模型是否会退化为SAR模型或SLM模型,检验结果均通过1%统计显著性检验,即SDM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他空间模型。因此,最终选择时间与空间双向固定的SDM模型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由表5.2可知,内部影响因素的系数方向大致与预期相符。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增加可减缓相对贫困,这可能是由于从性别差异角度看,男性相较于女性拥有更多资源且经营决策更加稳健,而女性比男性要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且女性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受到歧视与社会福利排斥,从而致使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提高。年龄越大,则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越高,农民工所处行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年龄的提高致使其被动丧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健康损耗因素”以及户籍制度限制致使农民工在城生活成本负担较高,从而陷入相对贫困。城市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可以改善其贫困状况,相较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回报率有益于提高农民工在城就业竞争力,促使转岗换业,由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就业转变,改善其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从而缓解其在城相对贫困程度。相较于未婚家庭,已婚家庭更容易减缓其在城相对剥夺境况。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与受教育年限提高对邻近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缓解效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农民外出务工通常是家庭角色分工的结果,农民工作为城市与乡村的“沟通桥梁”,其在城相对剥夺状况予以改善并在城安居乐业,有效发挥了示范效应,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树立了成功典范,乡村中的适龄男性剩余劳动力也逐渐向城市转移,以谋求家庭与自身效用最大化,进而带动周边城市男性农民工占比逐步提升,以此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有益于其突破社会阶层壁垒,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取更好社会地位,也为同阶层的农民工树立了形象典范,从而带动邻近地区农民工对基础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以此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改善多维

^①本文采用邻接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无明显差异。

相对贫困状况。为进一步把握各因素具体的影响方向及大小，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予以探讨，从直接效应来看，男性农民工占比、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已婚占比均通过了 5% 的显著性统计检验，可知男性占比、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已婚占比是内部因素中影响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因素。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系数均为负，且通过 10% 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技能，实现阶层跃迁，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途径，同时在相邻地区人员流动与信息传递作用下，也进一步促使周边地区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减缓。

5.3.2 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回归结果如表 5.2 可知，城市地方财政支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与信息化建设的变量系数为负，且均通过 10% 的显著性统计检验，通过构建外部“赋能”机制，从而有效发挥减贫效应。地方财政支出增加有益于相对贫困严重城市形成“造血”能力，财政支出增加不仅有益于政府扩大本地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保障性住房覆盖范围，降低了农民工在城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促进了公共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此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就业质量与生活水平，改善福利条件，缩小与城镇居民间的福利差距，以此缓解其相对剥夺程度。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匮乏以及正规部门就业门槛较高，农民工通常所从事工作的生活条件恶劣，面临大病大灾风险较高，且缺乏基本医疗卫生常识，致使其“因病致贫，被迫反贫”概率较高，但随着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与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提高了农民工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工的就医压力得以缓解，改善了农民工由于“健康损耗”所导致“因病致贫”的困境，从而促使其健康脱贫。城市信息化建设有益于信息与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传递与应用，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与移动互联网使用也降低了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其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强化了自我“造血能力”，以此缓解了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基础医疗投入增加不仅有益于缓解当地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境况，同时还对邻近城市的农民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由各效应分解结果可知，地方财政支出与信息化建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城市基础医疗水平具有负向且显著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这说明推动基

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减贫尤为重要。

表 5.2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固定效应分解		
	Main	Wx	LR-Direct	LR-Indirect	LR-Total
Gender	-0.046*** (-3.26)	-0.425* (-1.80)	-0.048*** (-3.24)	-0.792 (-1.22)	-0.839 (-1.29)
Age	0.003*** (3.34)	-0.002 (-0.16)	0.003*** (3.34)	-0.004 (-0.17)	-0.002 (-0.07)
Edu	-0.017*** (-8.12)	-0.140*** (-4.09)	-0.018*** (-8.25)	-0.273* (-1.67)	-0.291* (-1.77)
Marry	-0.042*** (-2.62)	0.400 (1.53)	-0.040** (-2.44)	0.731 (0.99)	0.691 (0.93)
Transpro	-0.003 (-0.37)	0.071 (0.81)	-0.002 (-0.33)	0.134 (0.49)	0.132 (0.48)
lnGDP	-0.021 (-1.32)	0.134 (1.20)	-0.020 (-1.24)	0.239 (0.81)	0.220 (0.75)
Etestudent	-0.154 (-0.63)	2.356 (0.71)	-0.143 (-0.57)	4.217 (0.55)	4.074 (0.53)
Mtestudent	-0.032 (-0.29)	-1.119 (-0.72)	-0.041 (-0.38)	-2.094 (-0.62)	-2.135 (-0.63)
lnCost	-0.031** (-2.35)	0.076 (0.55)	-0.029** (-2.31)	0.093 (0.31)	0.063 (0.21)
lnHospbed	-0.010*** (-2.81)	-0.206*** (-3.36)	-0.011*** (-2.96)	-0.388* (-1.89)	-0.399* (-1.93)
lnInternet	-0.010* (-1.85)	0.037 (0.66)	-0.011* (-1.93)	0.052 (0.39)	0.042 (0.31)
rho		0.387** (2.12)			
sigma2_e		0.001*** (25.71)			
Observations			1325		
Number of id			265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 0.01、0.05、0.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 值。

6 改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在 2020 年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后，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逐渐凸显，由此也对城市相对贫困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提出了系列相对贫困治理措施，包括增强城市包容性与开放性、提升农民工生活保障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等，旨在为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支持。

6.1 统筹协调城市建设，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

农民工通常采取跨省迁移的方式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以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户籍限制、就业歧视以及观念认同等因素制约，致使农民工的职业与阶层向上流动能力削弱，从而陷入多维剥夺的窘境。因此，为了巩固东部地区城市既有的减贫成效，亟需加强这些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包容性，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抓手，增加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以及公共政策的普惠性，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公共医疗、就业服务与教育体制改革，增强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逐步缓解社会保障待遇差距、清除同工不同酬现象，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使农民工享有均等参与及发展的权力，以此缓解其社会孤立与剥夺感。同时，由于农民工偏好向东部地区迁移，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城市群，无疑提高了城市治理成本，因此，除了增强城市包容性外，还应积极促进东部城市群内部间的协调统筹发展，以点带面，增强农民工集聚核心城市对邻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体化建设进程，增强农民工自由流动能力，缓解人口集聚与土地利用间的矛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避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切实提高农民工在城生活质量。

中西部地区部分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交通便利、自然资源禀赋丰富以及公共服务质量供给较高的城市对农民工的向心力不容小觑，已然成为农民工回流的次优选择。中西部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完备的文化服务设施、完善的劳动权益保障、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使得农民工在城相对剥夺状况较轻。因此，中西部城市应继续“维稳”较低的相对贫困状况，持续关注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在未来的发展走向，依托一体化经济发展，抓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契机，扩大就业容

量,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立足地区产业规划,顺应产业升级趋势,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与优秀人才,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提档升级,增加农民工脱贫与致富机会,促使其“离土不离乡”,实现就近城镇化。同时,应继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财政支持力度,围绕医疗保障、公共卫生、就业服务以及基础教育等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推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公共产品质量,缩小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公共服务供给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工享有及维护基本的城市公民权利。

6.2 提升生活保障水平,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而言是保障其在城务工的重要支撑,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减缓农民工在城生活成本,以减缓其相对贫困状况。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可及性与减轻负担性,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以此来保障农民工在城生活的基本权利。其次,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的补贴标准、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城镇医疗保险以及加强引导农民工适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补充等方式,逐步缩小与城镇居民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促使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提高其获得感与满足感。再次,还可以加强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保障水平,加强对拖欠工资企业的打击力度,以此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合理安排城市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完善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增加住房保障供给,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缩小其与城镇居民间的福利差距,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则显得尤为突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相对贫困群体通常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往往只能通过传统媒介获取信息,这种方式无法提供丰富的、实时的信息,从而加重农民工群体的信息不对称性,陷入贫困陷阱。因此,在信息可及性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速宽带网络和无线覆盖范围,同时,为农民工群体购买数字设备提供免息小额贷款或资金支持,以此提高农民工获取数字技术与信息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要用,更要用好,良好的数字素养是农民工在数字化时代

参与和获得利益的基础,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移动端为农民工提供远程教育服务,例如互联网金融培训、数字办公技能培训与在线职业培训等,助力农民工掌握与运用数字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除此之外,政府与企业可以联合发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发挥数字经济的创造效应,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实现持续增收稳定就业,进而缓解其相对贫困状况。

6.3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增强内生脱贫动力

相较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回报率有益于提高农民工在城就业竞争力,促使转岗换业,而教育水平则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教育投资同时也是提高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活品质,实现脱贫的重要渠道。通过社区宣传、网络传播等信息技术,提高农民工对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并举,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并重的政策,通过线上线下教育相结合以及灵活授课等渠道不断增加其受教育以及专业技能水平,弥合城镇化进程中知识与技能断裂,减少其在城失业风险,增强在城生存能力,提高向上流动概率,缓解其被剥夺状况。改革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入,使其与城市居民平等享有接受教育机会,同时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长期视域下提升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水平以及综合素质水平,以此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关系到劳动力个体的工作热情与劳动效率,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通常拥有更好的教育、技能以及工作机会,从而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与社会地位,相对而言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低。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通常面临着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风险,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从而更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可以在农民工集聚的社区与务工地处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向农民工提供健康知识以及生活方式建议,以此提高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通过规范行业要求与用工标准,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装备保护,切实规范劳动力的使用与监督,从而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以此减少其受到的身体伤害与职业病风险。同时,农民工由于社会地位较低,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生产效率,通过网络宣传与社区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农民工的认识与尊重,鼓励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支持与关注,从而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满足感与价值感,缓解其心理障碍,提高其劳动生产效率,促使其健康脱贫。

7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7.1 全文总结

本文以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与生活保障三个维度六个指标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评价体系,基于“三大区域—城市群—城市”等多尺度视角,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期望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和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一定支撑,主要结论如下:(1)从整体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逐渐改善,贫困发生率逐步降低;从不同维度看,生活保障维度的贫困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而经济条件与自我发展维度对贫困贡献率均趋于上升,其中就业状况与教育水平贡献度增幅较高。(2)从空间分异看,三大区域尺度,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贫困减缓幅度较大;城市群尺度,农民工主要集聚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多维相对贫困改善幅度较为明显;城市尺度,相较于小规模与低等级城市,人口规模与等级较高城市贫困缓解幅度较大。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且低—低集聚型城市主要分布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从影响因素看,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受多方面力量影响。内部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婚姻状况差异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教育减贫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外部因素,地方财政支出增加、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化水平提高均有益于产生外部“赋能”机制,促使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缓解,公共医疗投资对于贫困的抑制作用同样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特征。

7.2 不足与研究展望

研究不足:目前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最新更新至2018年,微观数据调查年份有限;多维相对贫困体系的指标选取仍均有一定主观性,虽然本文在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时参考了众多文献,但仍未能完全规避主观性;由于数据可及性,本文仅关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因素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他诸如农民工留守经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剖析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空间分异的机制。

未来展望：未来通过自主调查以及数据更新，以期运用最新数据对疫情后的农民工群体多维相对贫困情况予以测度；其次，多维相对贫困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后扶贫时代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樊增增,邹薇.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21,(10):59-77.
- [2] 郭君平,谭清香,曲颂.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测量与分析——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8,(9):94-109.
- [3] 曹艳春,叶怡君.国内多维相对贫困研究现状与前沿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16):33-37.
- [4] 慈勤英,张芳.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03):1-5.
- [5] 郭劲光.我国扶贫治理的空间视野及其与减灾防治的链接[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07):11-16+110.
- [6] Benson T., Chamberlin J., & Rhinehart I.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l prevalence of poverty in rural Malawi[J]. Food Policy,2005,30(5).
- [7] 李鹏,张奇林,高明.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相对贫困:内涵、识别与治理路径[J].经济学家,2021,(05):93-101.
- [8] 侯守杰.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36-42.
- [9] 董帅兵,郝亚光.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1-11.
- [10] 郑琼洁,潘文轩.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J].财经科学,2021,(11):36-49.
- [11] Rowntree B S.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J]. The Economic Journal,1902,

(65):260-266.

[12] Townsend T R. Introduction: Concepts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1979,15(4):499-501.

[13] Sen A.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3,35(2).

[14] Atkinson A B.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Contrasting Social Welfare and Counting Approache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3, (1):51-65.

[15] 向德平,向凯.多元与发展:相对贫困的内涵及治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31-38.

[16] 江立华.相对贫困与2020年后贫困治理战略[J].社会发展研究,2020,(03):5-14.

[17] 张明皓,豆书龙.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的变化与贫困治理转型[J].改革,2020,(07):98-107.

[18] 王国敏,侯守杰.后小康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难点、标准识别及应对之策[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02):106-113+213.

[19] 张传洲.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112-119.

[20] 刘佳,曹景林.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差异化治理及其测度[J].求是学刊,2021,(02):9-17.

[21] 罗必良.相对贫困治理:性质、策略与长效机制[J].求索,2020,(06):18-27.

[22] 韩广富,辛远.农村相对贫困的特征、境遇及长效解决机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9):119-130.

[23] 方迎风,周少驰.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06):21-30.

[24] 潘文轩,阎新奇.2020年后制定农村贫困新标准的前瞻性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0,(05):17-27.

[25] 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

后的减贫战略[J].改革,2019,(12):5-15.

[26] 孙久文,夏添.中国扶贫战略与 2020 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 (10):98-113.

[27] 沈扬扬,李实.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91-101+191.

[28] 夏春萍,雷欣悦,王翠翠.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31 省的多维贫困测度[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08):229-238.

[29] 周云波,贺坤.精准扶贫视角下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瞄准性比较[J].财经科学,2020 (1):106-119.

[30] 刘洪,张想想.相对贫困: 内涵特征、多维困境与研究展望[J].世界农业,2022,(06):66-76.

[31] Alkire S., James Foster.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0,(7):476-484.

[32] 王小林,冯贺霞.2020 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20,(03):2-21.

[33] 何宗樾,宋旭光.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8,(05):82-89.

[34] 蒋南平,郑万军.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测度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17,(06):58-69.

[35] 高明,唐丽霞.多维贫困的精准识别——基于修正的 FGT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J].经济评论,2018,(02):30-43.

[36] 张立冬.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7,(12):102-108.

- [37] 张全红,李博,周强.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31-42.
- [38] 蒋永穆,谢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1,(04):15-24+2.
- [39] 胡联,缪宁,姚绍群,汪三贵.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变动和分解: 2002 ~ 2018[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02):132-146.
- [40] Bautista C. Explain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Household-Level Analysis[J]. Asian Economic Papers,2018,17(3).
- [41] Fu X., Akter S.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o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Delivery: Evidence from India[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6,52(11).
- [42] Langmia K. The Role of ICT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2006,2:144-156.
- [43] Batana Y.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mong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3,112(2).
- [44] Álvarez-Gamboa J., Cabrera-Barona P., & Jácome-Estrella 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Ecuador: A spatial approach[J]. 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021,22.
- [45] Joshua O., Kayode A., Fanifosi g. An analysi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Niger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7,9(11).
- [46] 闫坤,于树一.中国模式反贫困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要素[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06):1-11.
- [47] 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14-26+171.

- [48] 龚维进,覃成林,李超.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5):24-37.
- [49] 邱峰,庄天慧,陈光燕.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分析[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1,(04):556-564.
- [50] 张咏梅,张萌,赵金凯.“后扶贫时代”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2,(09):69-73.
- [51] 张林,邹迎香.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及其治理问题研究进展[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14.
- [52] 赵玉亮,邓宏图.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J].经济科学,2009,(01):17-29.
- [53] 郭熙保,周强.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J].经济研究,2016,(06):143-156.
- [54] 陈烨烽,王艳慧,赵文吉,胡卓玮,段福州.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J].地理学报,2017,(10):1827-1844.
- [55] 周国华,张汝娇,贺艳华,戴柳燕,张丽.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J].地理科学进展,2020,(06):902-912.
- [56] 张承,彭新万,陈华脉.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及其驱动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11):15-29.
- [57] 朱晓,秦敏.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115-129.
- [58] 杨帆,庄天慧.父辈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J].农村经济,2018,(12):115-122.

- [59] 彭新万,张承.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J].求实,2022,(01):68-80+111.
- [60] 罗明忠,唐超,吴小立.培训参与有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吗?——源自河南省3278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43-56+189-190.
- [61] 郑时彦,王志章.我国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实证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检验[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12-126+221.
- [62] 栾江,马瑞.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10):75-79.
- [63] 聂荣,苏剑峰.中国农村贫困动态特征及其区域差异[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27-38.
- [64] 仲超,林闽钢.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112-120.
- [65] 朱晓,段成荣.“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16,(03):30-44.
- [66] 左孝凡,陆继霞.互联网使用与农民相对贫困: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J].电子政务,2020,(04):13-24.
- [67] 谭燕芝,张子豪,睦张媛.非正规金融能否促进农户脱贫——基于CFPS 2012年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02):41-50.
- [68] Ivanová E., Grmanová E. The Sustainability of EU Labor Immigration in Terms of Poverty Inequalities and Employment[J]. Sustainability,2021,13(4).
- [69] Gustafsson B., Jakobsen V., & Mac Innes H. Older immigrants – new poverty risk in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s?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21,1-22

- [70] Lokshin M., Bontch-Osmolovski M., & Glinskaya E. Work-Related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Nepal[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14(2).
- [71] Gibson J., Datt G., Murgai R., & Ravallion M. For India's rural poor, growing towns matter more than growing cities[J]. World Development,2017,98, 413-429.
- [72] Emran M. S., Shilpi F. Beyond dualis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small town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Bangladesh[J]. World Development,2018,107, 264-276.
- [73] 王国敏,何莉琼.我国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协同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100-111.
- [74] 叶普万.农民工贫困的演变路径与减贫战略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3,(12):111-116.
- [75] 李实,吴彬彬.中国外出农民工经济状况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0,(05):36-52.
- [76] 何凌霄,吴海江,张忠根.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5,(06):15-26.
- [77] 王美艳.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J].宏观经济研究,2014,(09):3-16+26.
- [78] 王建英,陈志钢,毕洁颖.扶贫与发展的有效结合——浙江省扶贫实践探索及其对 2020 年后中国扶贫战略的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4):82-100.
- [79] 王春超,叶琴.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4,(12):159-174.
- [80] 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何晓军,王子妹一.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 2020 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J].中国农村经济,2019,(01):2-16.
- [81] 杨舸.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现状、风险与政策[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

(01):13-22.

[82] 李建民,王婷,孙智帅.从健康优势到健康劣势:乡城流动人口中的“流行病学悖论”[J].人口研究,2018,(06):46-60.

[83] 宋月萍,李龙.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探析[J].中州学刊,2015,(01):79-83.

[84] 祝仲坤,郑裕璇,冷晨昕,陶建平.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与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20,(03):54-68.

[85] 郭郡郡,刘玉萍.可行能力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9,(11):95-103.

[86] 葛笑如.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农民工贫困问题再审视[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38-43.

[87] 祝仲坤.住房公积金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12):33-48.

[88] 王大哲,朱红根,钱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吗? [J].中国农村经济,2022,(08):16-34.

[89] 易莹莹,陆书馨.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J].财经论丛,2022,(06):41-51.

[90] 贺坤,周云波.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2):42-54.

[91] 王亚军,郑晓冬,方向明,陈典.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1,1-18.

致谢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的硕士生涯即将结束，也到了与母校告别的时候。三年的时光如梦一般匆匆而过，聚散终有时。这三年看似一切不变，却又变化万千。在学习期间，我珍惜每一刻，认真听课，课后赴图书馆学习，不断汲取专业知识。回顾这三年，我十分感激自己没有浪费这段珍贵的时光。如果说撰写论文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坎坷之路，是将未知变为已知的过程，那么毕业带来的心情则充满了复杂与难舍。

难离难舍，难舍难分。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高云虹教授。在学术能力培养和日常生活中，老师不遗余力地指导我。我至今仍深受在我第一篇论文的写作、修改和投稿中给予的精心指导。每次与老师交流学术问题时，总是能够耐心地引导我深入思考，激发我的研究兴趣。老师的严谨态度对我的职业素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知道无论从事哪个领域，认真二字是交出满意答卷的必要条件。

其次，我要感谢我三年来遇到的所有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在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的学习中，在任课老师的带领下，我不断吸收本专业知识，并将课本知识融入到实际中，为未来的工作和专业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感谢师姐师兄们在学术与生活问题上的精心指导，特别是杨钊师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生活琐事，每次都能得到其耐心解答和鼓励，对此我深表感激。感谢好友群里的刘淼、王毅、张静等好友的一路陪伴，让我的求学之路不再孤单；感谢我的舍友为我在生活中增添了很多欢乐，此去经年，唯愿诸君一切顺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们，你们对我的爱与包容是我与困难抗衡时的最大底气，是驱散我人生中阴霾的万丈光芒。

感谢母校以及所有关心与帮助过我的人，祝福母校越办越好，愿在座的诸位都能够未来的日子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